



西安地方志

2012·第4期

(总第217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目 录

## 我们的村落

- 享誉三秦的花灯之乡——三兆村 …… 张树森(3)  
 名人、文物聚集的翁家庄 …………… (5)  
 汉宣帝皇亲国戚的后裔居住地——王前村  
 …………… (6)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王莽长安改制 …………… (8)

## 学术交流

- 关于提升志书内在品质的思考(下)  
 …………… 陈 野(10)

## 人物春秋

- 贫苦农民出身的西安市长——刘庚 …………… (16)

## 史料钩沉

- 鲁迅与沈从文为何老死不相往来 …………… (18)  
 三线记忆 …………… (20)

## 1971年鲜为人知的“国共合作”：共卫钓鱼岛

- …………… (22)

- 两岸合编词典鲜为人知的故事 …………… (25)

## 西安风情

- 西安火车站 …………… (28)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二)——金光门  
 …………… (29)

- 回望百年西安易俗社 …………… (30)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 周至二曲礼仪 …………… 富小云整理(32)

## 文史拾趣

- 文景之治是如何“治”的 …………… (33)

古代科举对官宦子弟的限制 .....	(35)
民国时文人的日子 .....	(37)
毛泽东评点《红楼梦》 .....	(41)
奥运奖金知多少 .....	(43)
<b>志鉴动态</b>	
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业务工作务虚会 .....	(46)
务虚会发言摘要 .....	(47)
长安区举办《长安区志》撰稿人员培训班 .....	(51)
新城区《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进展顺利 .....	(51)
临潼区志办召开《西安村落记忆》编纂工作推进会 .....	(53)
<b>知识窗</b>	
“百姓”曾用来指贵族 .....	(54)
为什么一件事没结果叫“黄”了 .....	(54)
中国第一位奥运冠军 .....	(54)
中国第一位奥运女冠军 .....	(54)
“约法三章”的典故 .....	(55)
宦官和太监有何区别 .....	(55)
中国人口最少的姓氏 .....	(55)
<b>历代诗人咏长安</b>	
山坡羊·骊山怀古(二首) .....	(元)张养浩(56)
<b>解字</b>	
“克” .....	(17)
“尧” .....	(28)
<b>名句欣赏</b>	
【行德则兴 倍德则崩】等五句 .....	(9)

##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责任编辑:宋亚颖 王文竹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http://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mailto: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为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市政府同意,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西安村落资料,《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2]18号)已经下发。我们拟在资料征集工作完成后,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上、中、下),同时在“西安地情网”上开设相关专栏,留存西安村落资料,宣传西安村落。

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目的就在于,配合该项工作的开展,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 享誉三秦的花灯之乡——三兆村

◎ 张树森



位于西望曲江晚照,南眺终南如屏,东有浐河环绕的杜陵原上,汉宣帝刘询寝陵北侧之雁塔区三兆村,以其花灯制作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色彩艳丽、做工精巧而闻名古城,享誉省内外乃至美、日、韩诸国,素有“三兆花灯村”美称。

相传三兆村制作灯笼的历史源起于汉代,唐时每年皇家在曲江御苑举办灯会即有

三兆村花灯倩影。据有关史料载:一说是汉宣帝刘询下葬后,朝廷派出大批兵士为其守陵,此后他的大臣、妃子也多葬于附近,遂守陵人越来越多聚居此地形成村落。守陵人闲来无事,就做灯笼打发时间,渐渐形成规模,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另一说是北魏时期,战乱不断,汉宣帝刘询墓区盗墓之事时有发生,且多在半夜时分,为保护陵墓,有的守陵人就做灯笼挂在墓地上,晚上点亮,彻夜不灭,盗贼不敢光顾。在一家带头众皆效仿下,灯笼制作就得到代代相传。时因村有三个墓区即“兆域”或似为最初有三户赵姓人居此而得名“三兆”和“三赵”。宋、金两代均称三赵村,清代称三兆村,民国时期设三兆镇,归属长安县。1954年12月划归雁塔区管辖,按自然方位分为东、西、南、北4门。2010年全村计有15个村



民小组,1300 多户 5000 多人,几乎家家都从事灯笼制作和销售,系雁塔区最大的行政村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兆村花灯被斥为“旧文化”遭到横扫,许多难得的制灯工具和灯样被烧毁,三兆村花灯的发展陷于低谷。20 世纪 80 年代,三兆村花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伴随商品生产的发展再度兴起,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之后,为适应和满足人们节日生活、喜庆活动对花灯市场的更高需求,三兆村花灯制作工艺提升进程也随之加快。在 21 世纪初即实现了传统的竹质框架和纸质面料逐步被各种规格的铁丝、钢丝框架和金丝绒、绸子面料的“两个取代”,并设计制作出机械运动与声、光、电相结合具有现代气息的各式灯笼和能够折叠,便于携带、运输、保存的“合子灯”,以质量占领市场赢得发展。1991~2010 年 20 年间三兆村花灯品种即从以莲花灯、竹篾灯为主的 10 余个发展到大小宫灯、动物灯及花卉灯三个大类 100 个,其数量也由年产 100 万只增至 600 万只。此间,面对西安市花灯市场趋于饱和的状况,一些有胆识的三兆村花灯户在春节前后走出家门,东到沈阳,南至广州,西达新疆,北赴内蒙古较大城市安营扎寨

现做现卖,取得成功。遂使外出做灯户逐年扩大,1998 年即达 250 户之多,户均花灯制售收入达 1 万余元。并在持续保持每年春节至少向西安市场投放花灯 250 万只,约占整个花灯市场份额七八成,在销售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同时,走出国门扩展海外市场。2000 年、2001 年三兆村花灯户呼建毅两次应邀赴韩国为晋州

市南江国际灯祝祭分别制作高 11 米的大莲花灯、巨型金龙灯和金凤凰灯。并有大红绸宫灯售往美国堪萨斯城和日本福岗,为其城市庆典增辉,为三兆花灯赢得国际声誉。还走进影视城为电影《屠夫状元》《丝路花雨》等多部电影拍摄制作道具。创出了“神州红宫灯”名牌,蚂蚱灯和 12 生肖灯曾代表陕西的民间艺术到北京展示,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呼延花灯”“智恒花灯”等品牌花灯。

如今,传统的三兆村花灯已在寻求新的突破中向着创新的方向发展,开始了以单一的家庭式制售经营为主向通过花灯协会组织货源、批发销售的转变,初步实现了花灯生产工艺由原来的单纯手工制作向大规模运用电焊机、点断机、斡角机等现代机器进行制作的过渡。花灯产业化升级的经济效益日益显现,三兆村在 20 世纪 80 年代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又于 1995 年实现人均收入 2000 元,迈出步入小康村行列坚实一步。2008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6800 元,高出雁塔区农民人均收入 215 元。2010 年全村仅花灯一项销售收入即达 6000 万元,户均收入 46000 元。先后被列入陕西省、西安市“一村一品”示范村和“新农村建设重点村”。

## 名人、文物聚集的翁家庄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传奇，一个村庄的变迁，就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大凡年龄在 60 岁左右的北郊人，提起 1964 年在全国农村开展的“社教”运动会记忆犹新，尤其是发生在翁家庄、震动了整个北郊的一起冤案。那时在翁家庄搞了翁振刚的所谓罪恶史展，其家被抄，又被划为地主成分，本人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妄加罪名，被捕入狱长达 14 年。1978 年平反(刑期同时已满)，并恢复了名誉。翁振刚，曾任翁家庄村农会主任。解放初，因其工作积极出色，成绩显著，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被选为区、市人大代表。翁家庄从此在北郊出了名，成为家喻户晓的村庄。

翁家庄是一个名人聚集的村庄。翁崇刚是北郊名人，国民党时期曾担任乡长、联保主任职务，思想比较进步。他在任伪职期间曾多次为陕北解放区送过粮食、布匹、棉花等物资。1980 年当选为未央区人大代表。

翁自敬，曾任陕西省国民政府建设厅厅长，西安三兆公墓是他在任期间筹建的。

翁良佐，翁家庄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杨虎城将军的参谋长。

翁毅哉(1907.3~1981.11)曾任西安市第六届政协委员，解放前在杨虎城麾下任连长，曾营救过原陕西省副省长孙作斌和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并护送进步青年李健(原贵阳大学校长)到陕北参加革命。解放后，从翁家庄村走出并担任过县(团)级职位以上的就有 10 人。

在翁家庄有一件珍贵的文物，即于右任

亲笔书写的牌匾。2000 年《华商报》曾以《文物当床板，一睡五十年》为题，报道了这块牌匾的来龙去脉，《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各界导报》《陕西工人报》《陕西农民报》亦登载此消息，在全市产生了轰动效应。2000 年，在翁文义家发现了这块由于右任亲笔题写保存了 55 年的描金大字“允浮乡云”祝寿牌匾，匾长 242cm，宽 90cm，黑底金字，字迹清楚。匾左边刻“诚斋翁老伯大人七秩”，右边下刻“于右任”，落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祝寿匾的来历还得追溯到 1945 年，时任杨善乡乡长、联保主任翁崇刚，社交广泛，和于右任交往甚密，这一年其父 70 寿辰。当时长安一带 22 位知名乡绅、名人联名给这位老人祝寿，于是托人让于右任题写了此匾，敬送给老人，以表祝贺。土改时，翁崇刚家被定为地主成分，村上将这块牌匾分给了贫农翁文义，其家把此匾当床板使用，至今仍保存在翁文义家。

1958 年，翁家庄村上搞了个“火箭农场”，出现了翁文义、翁文祥等突击手，在北郊以至全市曾名声大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各界群众的关注，到该农场参观、取经、学习。

历史上有记载的翁家庄是明代。明洪武年间，西安府五城兵马司指挥官武略将军翁建，字本仁，别号北泉。翁北泉住此村，故称翁指挥庄。清嘉庆《咸宁县志》称翁家庄。原村庄有小城堡一座，毁于 1962 年。解放后，翁家庄归属长安县杨善区第一乡。1955 年 4 月，归属草滩区第七乡。1957 年 8 月，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为杨善乡下属的一个高级农业

## ●我们的村落●

生产合作社。1958年8月,翁家庄为汉城公社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1960年8月,翁家庄归属北康管区。1962年5月,翁家庄与尤家庄、王前村、南李村、北康村5个生产大队合并,成立永丰生产大队。1972年10月,恢复原村名,1985年4月,划归张家堡街道办事处。

从1992年开始,全村土地除老村和预留的生活用地外,均被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征用,预留的114亩生活用地,又被经济技术开发区租用,每年给每人发800元作为生活补偿。全村道路从1995年开始全部硬化,全村各户都盖起了三层以上的楼房,人均住宅面积达80平方米以上。因处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几条主要道路边,学生、外来人口流量相当大,逐渐形

成了以村为中心的集贸市场,村里主要街道商店、食堂、蔬菜、肉食零售点遍布。村民以出租房屋为主要生活来源。村委会组织村民外出旅游,老年节、儿童节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活跃村民的文化生活。据2007年统计,全村土地面积0.678平方公里,172户,606人。人均纯收入达5148元,经济总收入2540万元。

2008年7至9月,因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城中村改造,将旧村整村拆除。原村庄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四路东段,距张家堡街道办事处500米,村东为海荣住宅小区,村西是文景路,南有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北临西安中学新校。

(本文选自西安市未央区城中村村史《记忆》)

# 汉宣帝皇亲国戚的后裔居住地 ——王前村



在西安市凤城三路、文景路中段有一处游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文景公园。进入公园,引人注目的是一组雕塑“女娲补天”,另一处是一个庞大的土台遗址,游人稍加留意,便可看到土台下有一醒目的青石碑,正面上刻着的文字是“西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间是醒目的几个大字“西汉王夫人墓”,下刻“西安市人民政府,一九九八年八月。”碑的

背面有一段文字,记录了西汉王夫人的简历,文字里出现了“王前村”的一段话。游人只知道王夫人,现王前村在哪儿?人们已经看不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前村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以后的年轻人更不会知道这里曾经还有一个王前村。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这个只有几百口人家,却有着漫长历史的小村庄。

一件文物,就是一段难忘的历史,一处遗迹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故事承载着一种不朽的精神。王前村的历史,现熟知村史的人说是“守坟人”居住的村庄。守谁的坟?“王”字从哪来?“前”又从何讲起?王前村人的祖先是谁?……这还要追溯到距今二千年前的西汉时期。据传明崇祯年间,村前有汉宣帝之母王夫人墓,故以墓为方位,称该村为王夫人坟

前村。村落的形成,传说是四川来的同族守墓人定居于此,逐繁衍成村。王夫人冢,又称姑婆冢。王夫人传说是汉宣帝刘询之母,汉宣帝继位后迁入此地,随迁之守墓人为本族亲属,故称王夫人墓为姑婆冢。

碑记载:位于张家堡街道办事处王前村东南 500 米农耕地内,西北临汉广明苑遗址,环丘形封土是“西汉武帝刘彻之孙史皇孙刘进夫人王翁须之陵”,史皇孙刘进为汉武帝戾太子刘据之子,史良娣所生,与其夫人王翁须皆因“巫蛊”之祸而同时被杀,初草葬汉都城外。公元前 73 年,其子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乃移葬其父母,诏谥史皇孙为“悼皇”,王夫人为“悼后”,其陵园称“悼园”,因其地在“广明苑”,故又称“广明园”。从以上历史记载,可以推断,王前村人的祖先应是汉宣帝的皇亲国戚的后裔。在王前村的历史记载中,还有一知名人士,叫“十四老”,其姓名亦无从考证。该人系清武举,力大如牛,相传有次去徐家堡,人们将几个人才能搬动的巨石,抬到村堡门口,将门堵住,他到门口后,一人将巨石搬走。

明崇祯年间,该村名“王家前头”,清嘉庆《长安县志》称“王前村”,村上在清咸丰年间修建城堡一座,占地 15 亩,墙宽 5 尺,高 3 丈,东、西、北各有门楼一座,后被毁。

新中国成立后,王前村归属长安县杨善区第一乡。1955 年 4 月,归属草滩区第七乡。1957 年 8 月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杨善乡下属的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 年 8 月,成立“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为汉城人民公社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1960 年 8 月,成立生产行政管理区,归属北康管区。1962 年 5 月,王前村与尤家庄、北康村、翁家庄、南李

村 5 个生产大队合并,成立永丰生产大队。1972 年 10 月恢复王前村名,至 2008 年。

历经了两千余年历史的王前村,由“守墓人”定居的小村庄发展到有村民 193 户,617 人,耕地 600 亩。2007 年,村有电话 164 部。从 1993 年开始,王前村属于张家堡街道管辖的一个行政村,后成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城中村。该村土地被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征用,建成了文景公园,剩余的 120 亩土地被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租用,每年给村民每人发放 1000 元的生活费。2008 年 4 月被拆迁前,全村都盖起三层以上小楼房,村民住房面积达到人均 100 平方米左右,建有约 600 多平米的村委会办公大院,有村民活动室、文化站、图书室、篮球场,村中道路全部为硬化的水泥路面。从 1995 年开始,全村 60 岁以上老人每月可领取到 20 元的生活补助费;村委会每年组织村民外出旅游观光;每年的“三八节”“老年节”以及春节村委会都会给妇女老人及每户村民送上节日慰问品。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为房屋出租、办商店、开旅馆、开服装店以及搞印刷等。到 2003 年底全村经济总收入 1252 万元,人均年收入 3990 元。2007 年人均收入 5116 元。

2008 年 4~5 月份,王前村因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城中村改造要求,整村已被拆除,原村委会被撤销,建立起了王前社区居委会。历经二千余年的王前村已在北郊人眼中消失,从此不复存在。“西汉王夫人墓”,它会唤起王前村后人对过去的回忆,它见证着王前村的悠久历史,王前人将会以新的面貌生活在现代大都市中,王前人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富裕,在新的征程上谱写出新的篇章。

(本文选自西安市未央区城中村村史《记忆》)

## 王莽长安改制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这种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极为鲜见。

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 4 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

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一个 9 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



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 8 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 9 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 8 口而田过一半(900 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 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





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

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 10 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 120 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 · 名句欣赏 ·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

道:正义。至:至极,到了极点。亲戚:古指血肉相连的亲近家族。畔:通“叛”。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孟子·尽心上》

德慧术知:道德、聪明、本领、才智。恒:经常。存乎:是由于。疢疾:灾患

**【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载周武王剑铭

倍:通“背”,背弃。崩:败坏。

**【良贾深藏如虚,君子有盛教如无】**——《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贾:商人。深藏:隐藏珍宝。盛教:犹言“盛德”。

**【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战国策·魏策四》

# 关于提升志书内在品质的思考（下）

◎ 陈野



（接上期）

## 三、提升志书内在品质的 对策建议

在当今志界，实践的迅猛推进既大步而又踉跄地超速于理论研究的进程，也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理论研究的滞缓。因此，具体编纂方法的探讨、创新固然重要，思想观念和学科理论上的合理性创新发展则更为急迫。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滞后于实践发展的理论则更有可能成为行动的阻碍。因此下文将着重从思想观念、思想方法层面，做些浅论。

（一）加强理论学习，重视学术研究，提高编纂者的理论修养和专业素质。

笔者一直认为，地方志具有行政与学术的双重属性，前

者体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志办的组织协调、承编单位的支持配合上；后者很大程度体现在志办专业人员的业务能力上。就编纂而言，志办专业人员除了对部门稿件作修改、总纂外，还要承担没有部门承编的内容。就研究而言，来自编纂实践的经验和问题急需总结指导，方志学的学科建设更是任重道远。所有这些，都是志办人员理应承担的职责，它既是志办面临的艰难任务，也是展示业务能力、专业水平的机会。而这种业务能力、专业水平，就需要建立在理论学习、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在当今志界机构行政化、人员身份参公管理化的趋势下，各级志办尤其需要树立重视理论学

习和学术研究的观念。志办还不是单纯的行政部门,自身承担着志书编纂的硬任务。举例而言,关于社会部类的“社会”二字,不同学科、不同使用场合、不同论述角度都有不同定义或说法。作为志书五大部类之一的“社会”,也理应有自己的概念界定。但自首轮修志至今,志界一直没有明确形成综合“社会”二字共性和志书社会部类记述个性的规范性概念。概念界定的不明确和不规范,造成社会部类记述的不确定性,对本部类和其他部类都产生了影响。类似情况在文化部类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都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通过专业研究加以解决。因此,志办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学习和研究的氛围,按照方志学学科规律和志书编纂业务规范开展工作。

(二)破除不合理的传统观念桎梏,寻求与时俱进的合理性创新发展。

地方志发展至今,在社会上不受重视的现象仍旧存在。究其原因,作为专业编纂、专门学问,有其特定的流通和接受圈子。不仅方志如此,很多专门学科如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逻辑学等都是如此,我们作为专业人员自可不必太过焦虑。但无可否认,方志自身发展存在问题也是重要的原因,比如来自传统社会的志书形式与现代社会的不相适应,现行志书编纂思想和规范中尚有不完善、不合理的成分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对待和加强二轮修志工作”,“创新是一切学术性工作的生命,地方志工作同样要提倡与时俱进的精神,把方志办切实建设成为创新型方志办”。从实践中看,二轮修志的创新需求和途径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已有修志规范中不合理、不科学和与当今时代发展要求不相符合等因素的改进和完善。

这里,特别需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做到有所因、有所创,前者的目的是为传承优秀的地方志文化传统,后者的目的则在保证地方志与时俱进的发展、永远生机勃勃。志书的创新,必须具有理论支撑,经得起实践检验;必须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能够凭借卓有成效的实绩被人们广泛接受;必须符合方志发展的内在逻辑又能走出广阔的发展新路。

(三)从我国传统史学和史学的时代发展趋势入手,寻求志书价值和品质提升空间。

志书编纂在具体形式上虽然明显不同于史,但作为修志主体的编纂人员,必须具有史的意识、观念和方法,从“史”而入,在中国的史学传统和史学发展的新趋势、新领域里,寻找地方志新的发展空间。纵观中国传统史学史,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特征:在史学目的上,强调资治、垂训;在与大众的关系上,呈“家族性”,为上层统治者所有;在阐述历史的演变轨迹上,强调汉族王室的“正统”观念;在民族关系上,“尊王攘夷”。这就导致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其中被视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在记述对象上以帝王为中心,视一姓的业绩为历史的全部,政治史、军事史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干。现代史学理论以其更科学、更现实的态度对史学提出新的要求。进入20世纪以来,各种新兴史学分支学科传入中国,开拓了新的史学格局。李大钊率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观,指出:“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

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以萌发于 20 世纪初、复兴于 20 世纪末的社会史研究而言,它以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等为研究对象,倡导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态度,是现代史学的重要构成,代表了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些史学新观念和新领域的开拓,足以使我们重新发现和估价地方志在传统史学中的贡献和应有地位,以及它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一是从传统史学来看,地方志正是对以正史为主流,以政治、军事为主体,以帝王业绩为中心的中国史学传统的一个补充和修正。顾颉刚曾言:“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武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而其材料,又直接取自档册函札碑碣之伦,顾亭林先生所谓采铜于山者。以较正史,则正史显其粗疏;以较报纸,则报纸表其杂乱。如此缜密系统之记载,顾无人焉能充分应用之,岂非学术界一大憾事也!”正是因为有了地方志书,政治、军事以外的内容得以大量保存,帝王业绩以外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得以彰显,正史之不足得以补充完善,传统史学体系之完整得以建构,传统史学之学术价值得以提高,地方志的价值也由此得到进一步揭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为地方志大展身手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全国各地社会变革发展迅猛、变化巨大的形势,党和国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以

人为本、关注民生、和谐发展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注重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学术研究趋向,为地方志尤其是市县志书的编纂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以特定区域为记述范围的,具有当代性、地方性、资料性、连续性、广泛性和真实性的志书,是一地社会发展的全面记录,记述好了一地的全面发展,记述好了一地基本的民情、民意与民生,就是记述好了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侧面。而所有志书的汇聚,则将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粲然可见。

二是从当今史学发展的趋势来看,以社会史为例,地方志的当代性、地方性,正是一个可以契合于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人口。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生活而言,是“研究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这样一个“社会史”的概念,涉及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人口、社会生活方式与风尚、其他直接表现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等内容。这个“社会”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部类”有所不同,具有“大社会”的含义。在当今高速发展、快速转型、急剧变迁的工业化、城市化时代,新旧更替之频繁,令人目不暇接。仅以农村民居建设来说,大量具有民族地域乡村自然生态文化特色的老村和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民居,逐渐被一个个千篇一律的新农民集居点所取代,不少古民居、古祠堂、古桥、古井等古文化遗址不复存在。一建一拆之间,损毁了乡村文化风貌、割裂了文化传统。因此,以上概念涉及的“社会”内容的记录、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和急迫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紧紧地跟住时代的步伐,全面翔实地记录时代变迁与发展的足迹,那就必然会造成国家历史、民族记

忆和文明历程的空白,留下历史的遗憾。举例而言,在志书编纂中,我们对当今社会在政治、经济双重作用下产生的改革和发展,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观念、行为、业态等方面的丰富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时代变革印迹,如城市化进程,服务型政府建设,流动人口的居住地生活,就业观念和方式变化,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网络、网吧、快递、创意、设计、动漫等新型业态,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记述。浙江省续修《青田县志》,十分重视收集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亡的传统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基础设施等资料,以图文对照的方式辑为《旧踪》收入志中,反映 20 年来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革。同时,他们在具体收集资料时,采访并记录知情老人的事件回忆、工艺介绍、手工示范等,获取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从全面系统记述的要求来审视,真正能够担起如此重任的,地方志具有莫大的优势。国家、省、市、县四级地方志机构行政体系的完整架构和人员编制的基本稳定,为全面系统开展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各级财政支持的相对固定和充分,为大规模的资料征集、实物征集、实地踏勘、实物保存提供经费保障;相关配套设施如办公场所、方志馆等的建设,为各种各类成果存放提供场地保障;志书作为“一地百科全书”的特性,为其广泛涉猎的合理性提供学科保障。所有这一切,在整个学术文化研究领域里,几乎为地方志所独有,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和信任,更是我们必须做好工作的责任。

(四)从借鉴西方史学观念和方法入手,拓展地方志的发展新途径。

改革开放 30 年来,大批西方史学理论名著在国内得到翻译出版,深入的研究随之展开,各种史学研究方法也得到引入,开始与中国史学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许多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如心理史学、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环境史、全球史等等。科学合理地在历史研究中引进、借鉴、运用西方史学理论成果,是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志界以前重视不够,今后可以尝试开展学术交流、吸取研究成果、拓展记述领域、完善自身学科体系的重要途径。此处仅选微观史学作为分析的例证。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史学鼎盛时,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问题史学、“长时段”理论和跨学科研究方法、从地区史到心态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结构主义、宏观过程、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现象”等等成为研究主流。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只有深入揭示历史的深层结构、宏观过程,才能真正说明历史的本质,或给人以全面了解。这种宏观研究忽视了不可重复的和特殊的事物,特别是忽视了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研究,使历史失去了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内容和面貌。微观史学是西方史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的一股新的史学潮流,其所选择的研究对象的特点不仅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更在于它特别丰厚的内容的积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宏观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枯燥的弊端,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的行为的研究。意大利微观史学代表人物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指出,历史学家应从一些微不足道、细微的小线索中发现问题,并力图从细小但结构密集的事实中引出重大结论,丰富对人

的行为的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规模的狭小及明确,微观史学家就有可能浓墨重彩加以剖析研究,而这恰恰克服了宏观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枯燥的弊端。

回顾自首轮修志至今,志书编纂也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从首轮修志的宜粗不宜细、重宏观概括等要求,到二轮修志中注重针对本地突出特色、重要现象、重大事件等,有计划地开展调研,用专志、专记、纪要、个案分析、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记述的做法,充分表明从具有鲜明特色和丰富内涵的个案着手进行深入解析探究,以此克服记述与研究中的抽象笼统之弊,在史、志两界均获重视,都有尝试,是一种异曲同工的不谋而合。志书编纂者已经逐渐认识到深化入志资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尝试解决方式;逐渐表现出贴近时代、社会和民众的现代意识,并在实践中努力着力体现。这些尝试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记述内容。

笔者认为,志书编纂者一方面需要整体把握重大社会变革内容,分门别类全面记载;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加强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更规范地借用相关史学分支学科理论和方法;进一步增加对“人”的关注和记述,既见事、又见物、更见人,充分反映人在事件中的行为和作用;进一步阐述此个案与周围世界的关联,则一定能够在提升志书品质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

(五)重视地情分析研究,深化对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分析与把握。

所谓地情研究,一是对记述时限内本地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基本情况

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分析研判。

所谓地方特色,一方面是本地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延续至记述时限内的地方特色,可以视之为相对固定的历史积淀,比如浙江作为鱼米之乡、丝茶之府的特色;另一方面,则是记述时限内形成的地方新特色,因为形成于当代,又与时代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视之为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部分。从续志记载的角度来看,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但也更难梳理、把握,因为前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相对明显和成型,大多已经成为一地的集体意识和文化共识,人们认可和接受的程度高。后者则因为发展时间短,研究不够深入,人们的认知、认可程度都尚需进一步加深、提高。这就需要编纂者着力研究分析,从本质上加以提炼把握。记述时限内的地方新特色,以浙江经济建设为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积极把握国内市场短缺的机遇,率先推进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培育块状经济,做大做强县域经济,从小商品入手,从家庭工业起步,经商与生产并举,打造“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域、大产业”的发展格局,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发展优势。这种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块状经济为特色、区域经济优势为竞争力的发展格局,在浙江县域经济发展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当之无愧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县(市)区的

地方新特色,比如义乌的小商品、永康的小五金、绍兴的轻纺城、嵊州的领带业、新昌的长毛兔等,莫不如此。各县(市)区的续修志书如果不能抓住这种源于改革开放的主因而产生的地方新特色,照搬前志或外地的既有篇目,

就很难说修得成一部成功的志书。

就第二轮修志来说,笔者一直认为志书对时代特征的表述,要逊于对地方特色的表现。主要原因在于,地方特色或者是历史上相沿相续的客观存在,耳熟能详,容易把握;或者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具体事物,眼见为实,容易感知。时代特征则相对较难把握,它不是一地的静态产物,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之中,需要通过前后不同时期、时段的比较方能知晓;不是一事一物的孤立存在,既与国家甚至世界性的大局相关,更由政治、经济、文化等错综复杂的多种因素交织而成。因此,编纂者在认识、把握时代特征时,不但需要了解当地情况,更需要对自己所在市、省乃至国家的发展大势,时代的发展本质有清楚认识。就续志来说,认识时代特征,首先需要从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有本质意义上的认识和把握。具体到浙江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者对浙江的时代发展特征,应该在宏观上具备了实现五个“历史性跨越”的认识和把握: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综合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跨越,体制机制形成先发优势;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跨越,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从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全省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从这个发展大势中去分析认识本地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历史、准确把握基本地情,以基本地情为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去建章立制、谋篇布局、取舍资料,才有可能高屋建瓴、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准确生动地选择取舍入志资料,在志书中深刻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本质,从而提升志书的内在质量。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几乎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的专家学者,都从宏观的、综合的、专题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系统研究,出版、发表过众多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分析之精、认识之深、研究之透、揭示之明,令人研读之下,有洞若观火之感,获益良多,均可以为我所用。(全文完)

(上接第 40 页)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再看涨,以至终于负担不起。“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李大钊遇害后,家中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钊的藏书来维系生活。1932 年 8 月 26 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蒋梦麟)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

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

邵洵美生在豪门,又娶豪门之女(盛宣怀的孙女、也是邵的表妹)为妻。据说盛去世时,家里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邵家五口人,仆人有三十多个。他年轻时,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餐馆,他每年的生日都在一品香过。邵属虎,每过生日,必事先在一品香定做一只与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



## 贫苦农民出身的西安市长 ——刘庚

刘庚,曾任西安市市长,陕西省副省长兼建委主任。中共七大、八大正式代表。

刘庚,1913年7月31日生,陕西省临潼区行者街道办水刘村人。曾用名刘鸿儒。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920年开始上学。1929年冬考入陕西省第一师范学校,1932年春转入陕西高中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运动。1932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组织同学开展抗日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同年4月因闹学潮学校被解散,到红军游击队。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1月被党组织派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工作,不久调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委员。1933年2月任渭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指导员。4月间任红军第二十六军陕北边区游击总队第十六支队指导员。同年夏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政治处干事。参加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抗粮抗捐,建立革命政权。8月任中共陕西省临潼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至1935年10月任中共临潼县委书记兼做共青团工作。1933年11月起任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到杨虎城部队的宪兵营任中

共特支书记。1936年10月在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下,参与组织和发动陕西乾县铁佛寺保安分队举行的武装起义,同月至12月任陕甘边抗日联军政治委员兼参谋长。同年12月至1937年1月任临潼抗日义勇军支队支队长。1936年冬至1939年10月任中共陕西省临潼县委书记。期间,1937年7月至9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干训班支部书记。1939年8月在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同年10月至1940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省委统战部干事(至1939年12月)。1940年1月赴延安参加七大。因大会延期,被分配工作,同月至1941年夏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机关总支生产干事、机关支部书记。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民运部第一科科长。1943年12月进西北局党校学习,后合并到中央党校五部。1944年夏在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习,1945年初转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6月被派往陕南参加迎接中原突围部队,接应成功。同年8月至1947年2月任中共豫鄂陕边区第二地方委员会书记、豫鄂陕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1947年2月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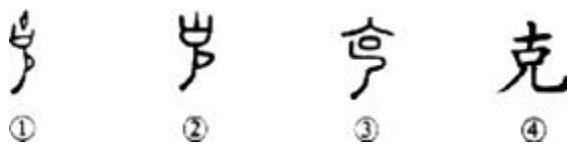
9月兼任豫鄂陕军区陕南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4月至5月任中原局党校秘书长。同年6月至1948年9月任抗日民主联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十八军党委委员。1948年6月至1949年4月任陕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49年5月至195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常委（1950年5月起）。1950年4月至1952年10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50年7月至1951年2月兼任中共陕南区委组织部部长。1952年10月至1956年9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兼人事厅厅长。1953年2月至1957年5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总党组成员。1953年3月至1965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1955年3月至1959年7月任陕西省第一届政协常委。1956年当选为中国八大代表并出席大会。同年12月至

1960年11月、1963年6月至1965年5月任西安市市长。1957年1月至1961年1月、1964年1月至1965年5月任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党组书记。1957年11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5月后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撤职、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后平反和恢复名誉。1978年3月至12月任陕西省劳动局副局长。期间进中共中央党校高级学习班学习。同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12月至1980年8月任陕西省副省长兼建委主任、党组书记。1980年9月至1983年5月任陕西省副省长、党组成员。1983年任陕西省政府党组成员、顾问。1984年1月至1985年2月任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驻广西整党联络小组副组长。1986年离休。1994年8月28日因病在西安逝世。

### ·解字·

# “克”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个“克”字本为象形字。甲骨文①的上部像人头上戴的冑（头盔），下部是一个面朝左而弯着腰的人。②是金文的形体，与甲骨文相似。③是小篆的写法。④为楷书的写法。

《说文》：“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此说不妥。许慎是仅就小篆的形体而加以臆测。其实，“克”字的本义应为“胜”，表示头戴冑的武士能够取胜之意，如诸葛亮《草庐对》：“操遂能克绍。”这就是说：曹操终于战胜了袁绍。由“战胜”引申为“能够”，如《尔雅·释言》：“克，能也。”柳宗元《贞符序》：“不克备究。”意思是：不能够完备地探究。后又可以引申为“克制”，如《后汉书·祭遵传》：“克己奉公。”《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

后世“克”字被假借为公制中计量质量和重量的一种单位，如一公斤等于一千克，一市斤等于五百克。

## 鲁迅与沈从文

### 为何老死不相往来

鲁迅与沈从文同为 20 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曾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文学大师却有着深深的隔阂，他们从来没有会过一次面，甚至连一次直接的通信都不曾有。有人说造成他们之间隔阂的原因是两人政治观、文学观的不同，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性格上的差异，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年鲁迅与沈从文交恶的直接起因却是缘于一场非常偶然的误会。



沈从文

1922 年沈从文从湘西“漂”到了北京，成为中国最早的“北漂”一族。这是沈从文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光，读书无路投亲无门，最后只好以“休芸芸”为笔名，将写成的文章向各处投去，赚些零星稿费糊口。此间沈从文认识了文学青年胡也频和丁玲，三个人非常好，沈从文和丁玲又都是湖南同乡，他们之间便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1925 年春夏之交，丁玲因上学无望处境困窘，准备离京回乡，临行前给鲁迅写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说一个弱女子在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没有出路，想请求鲁迅代她设法找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

当时鲁迅在文坛已是赫赫有名，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因此也常常有些无聊的人写信骚扰，此前不久就有人冒用“欧阳兰”这个女性的名字给鲁迅写信求助。鲁迅收到丁玲的信时正好刚刚发生了“欧阳兰事件”，鲁迅见状起了疑心，就托几个熟人帮忙打听一下，当时正编报纸副刊的孙伏园觉得丁玲的信字迹面熟：“这个字体好像是休芸芸的字，不过休芸芸是男的，不是女的。”第二天晚上，孙伏园又跑来向鲁迅报告说，岂明先生（周作人）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

原来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三人都喜欢



鲁迅

用硬笔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非常相像，兼之他们的字又都是有点女性的那种特点，特别秀气，所以在外人眼里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三人的这种字体曾闹了许多误会，以至于后来丁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时，编辑叶圣陶还以为是沈从文或胡也频的手笔呢。

鲁迅听了孙伏园的话后误以为真，认为沈从文冒充女人拿他开涮，因此发了脾气，无巧不成书，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胡也频又来拜访鲁迅。当时胡也频正在编一个文学副刊，一位熟识鲁迅的朋友就带他来向鲁迅取经，到了鲁迅寓所，胡也频便先将名片投了进去，谁知鲁迅一见却勃然大怒。原来胡也频正在追求丁玲，为讨恋人的欢心，便将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字样，所以鲁迅一下子更生气了，前面丁玲的信是假的，现在又来个“丁玲的弟弟”，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丁玲在《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回忆说：“这一天，他（胡也频）

只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

鲁迅对此事极为愤慨，把账都算在了沈从文身上，他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中里都用了一些尖刻的语言对沈从文进行挖苦、讽刺。1925年7月12日，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鲁迅文中所提的“欧阳兰”是北大学生，曾以女人名字发表文章，也曾给鲁迅写信求助，孙伏园还误认他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

对此一无所知的沈从文事后得知这一消息同样也生了气，几年后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这样写道：“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后来，与鲁迅有联系的一位编辑荆有麟从胡也频那里证实了确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无以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将这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心中的疑团和误会这才涣然冰释，对此鲁迅还觉得对不住丁玲：“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多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鲁迅虽然知道自己也冤枉了沈从文，但不知是疏忽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竟一句也没有提到对沈从文表示歉意的话。这就更加深了沈从文的不满，以至于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其见面，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有不少见面机会的。



## 三线记忆

他们来自于一个城市不是城市、乡村不是乡村的所在。那个地方通常只是一个代号，或者是 385 信箱，或者是 406 信箱。

他们是来自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三线人。四百万知识分子、技术骨干以及随后衍生出的数千万三线后代，他们在崇山峻岭之间构筑了至少两代人的生活。

1964 年，突然爆发的越战很快烧到了广西边境。解放军总参作战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国主要的工业 70% 以上都分布在沿海大中城市，这些城市人口稠密，而且主要交通干线也在这里，几座大城市周边还有一些大的水库，一旦发生战争，疏散困难，工业将受到较大打击，水库决堤后也将淹没部分城市。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苏联不正是将重工业迁往高加索地区，才赢得了那场与纳粹德国的决战吗？前车之鉴，并不遥远。

1965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出台，正式提出全面重点抓好三线建设。

### 攀枝花的董家骥

攀枝花曾是一片只有七户人家的荒凉之地。当确定在此建立一座大型钢铁厂时，毛泽东询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周恩来说，那里暂时还没有名字，只是漫山遍野开满了木棉花。毛

泽东说，哦，那就叫它攀枝花吧。

攀枝花是一座完全依赖三线建设兴起的城市，它的历史，就是三线建设的历史。

1965 年，32 岁的董家骥从武汉钢铁厂被抽调来支援建设攀枝花。当时从武钢与他一同调过来的有一百多人，“基本上老婆孩子都丢在武汉”。“没啥吃的，每天就是土豆、粉条。”令董家骥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的干群关系，“我们那个支部书记、队长、副队长，住在猪圈里头，那个地方最脏、最潮湿。”

守着金沙江，喝水却是一件难事。打一桶水上来，用明矾沉淀干净，早上洗脸，中午擦身子，晚上洗脚，完了不能倒，还要和泥用。

后来，董家骥的老婆孩子也来到了攀枝花，四口之家住在一间 15 平方米的风子里，上下铺，房子是木板拼凑的。“当年我们的口号是：不想爹来不想妈，一心建设攀枝花，不出铁不回家。那个时候职工的思想、心情啊，就想到为国家分忧，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要尽快地把攀枝花建设起来，你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睡不好觉，我们还能睡好觉吗？”

### 三线学兵冯小安

军代表当时向冯小安他们保证：“你们就

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就这一句话，冯小安动心了。那是 1970 年，他刚满 17 岁。

冯小安一直生活在西安，一连走了四天，他和同学们来到了驻地。“我们那个营地就在半山腰上。住的是帐篷，睡的是地铺，就是帐篷两边铺点草，用那个像船一样的木条这么一拦，中间走一个过道，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冯小安并不觉得苦，虽然什么都不如家里，但他觉得自己“还能承受”。“那真是一腔热血，满怀豪情”。往腰上绑根绳子，从悬崖峭壁上下下来，打钢钎，从没有路的地方硬生生地打出一条路来。“逢山修路，遇水搭桥，总之就是战天斗地，劈山啊。”那样的情怀，试问哪个年轻人不觉得豪情万丈呢。

当进入隧道工作后，他们开始提倡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神。冯小安所在的连队连续四个月隧道掘进速度超百米，这是打破纪录、可以列在铁道兵工程建设史上的。用他的话说：“我们一个月掘进速度为 131 米。铁道兵标杆连才 29 米。”

在他的讲述中，听不到太多的苦楚，这应该有性格的原因，而更多的，在冯小安看来，则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我们用稚嫩的双肩，撑起了共和国的重任，襄渝铁路是用我们的生命和鲜血铺就的。”

### 技术骨干刘光武

四川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在三线建设布局中成为重中之重。大量的三线工厂内迁至绵阳、彭州等地。

刘光武 31 岁那年，从无锡油罐厂调到四川彭州地区来参加三线建设。据他回忆，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来支援三线建设。“毕竟无锡是家乡，也是鱼米之乡啊。”有的人思想

工作没做通，厂里便对其采取了停工的措施。在那个年代，停工意味着生活断绝了一切希望，停上一段时间，便也只好背上行囊，听从指令，离开家乡。

当时位于彭州的锦江三线厂已经有职工两千余人，烧火做饭很不方便，因此厂革委会下决心自己研发蜂窝煤，便将这个设计任务交给了刘光武。刘光武花一个月的时间研发了打蜂窝煤的机器，解决了工厂内数千人生火做饭的头等大事，他也就此在那里扎下根来。

这么多年以后，说到当时的生活，刘光武倒也没觉得多么艰苦。“知识分子过田园生活，想想其实也还比较惬意。”在紧张工作之余，每逢周末，他便带着孩子去周边的水塘河沟抓泥鳅、黄鳝、虾、螃蟹，每次都能抓一大兜回来，好改善生活。

日子是一天天好转起来的，工厂自己开发了豆腐房、煤房，还修了邮局，办了商店，“除了火葬场没有，差不多我们该有的都有了，从幼儿园到厂办技校，什么都不缺”。

刘光武后来担任了工厂领导，一直在锦江厂干到退休，他的孩子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无锡已变得越发遥远和模糊。

在如今的刘光武看来，三线建设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具体做法上错了。不应该钻山，工厂坐落在崇山峻岭间，不仅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也使得工厂的下一代受教育程度极为有限，视野受到限制。

作为工厂曾经的领导，刘光武坦言：“我感觉到，这二十多年我尽力了，但是有点遗憾，尽了那么大力，有些东西做的是无用功，最后效果不是我想象的这个状况。”



## 两岸合编词典

# 鲜为人知的故事

2012年4月,两岸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大陆编委会与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分别在北京、台北宣布,经数百位两岸专家学者700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第一本小型词典《两岸常用词典》已付梓,两本科技词语词典也取得阶段性成果。实际上,在消除海峡两岸词语差异的路上,有识人士已经走了将近20年。

### 误会,“程式规划”非“城市规划”

1994年1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新竹清华大学教授徐统在信中写道:1993年11月在台北举行的两岸电子显微镜研讨会上,两岸专家是用台湾“国语”、大陆普通话和英语交替使用的。因为两岸在汉语名词上有差异,不得不借助英语来判断。

无独有偶,2003年1月26日,台商春节返乡包机首次起飞。回台后,执行首飞的“中华航空”机长张以松说,飞机刚进入大陆领空,从空中传来航管人员一声国语“你好”,立刻有回家的感觉。不过,当记者问,这段空中对话后来如何,张以松却坦承,因为两岸航空术语不同,安全起见,他们改用英语交谈了。

“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化,现在却要用英文辅助交流,这是多么尴尬的事啊!”《两岸常用

词典》大陆编辑组专家王铁琨说。尴尬是难以回避的现实。分隔60多年,海峡两岸不少字词出现形、音、义的差异,尤以科技词语为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科技名词委”)副主任刘青介绍,两岸分隔的半个世纪,正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阶段,由于互不沟通,各自定名,一些新兴学科,比如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两岸完全相同的只有58%,相对较好的基础学科如物理学,也有约20%不一致。

“你知道‘行’和‘列’在两岸的概念不同吗?”刘青说,两岸专家谈到矩阵、行列式等数学概念时,总觉得哪不对劲儿,后来才发现,“行”和“列”在两岸正好是相反的,“在会场上,我们说让第一行的人站起来。结果,他们坐在第一列的人全站起来了!”

在两岸开启交流大门后,这些差异导致过不少误会。刘青讲了一个真实故事。10年前,一个台湾专家团到大陆访问。他们自我介绍,主要工作是“软体开发和程式规划”。大陆专家听后,询问他们是如何与交通、水电、通信、建筑部门合作的。台湾专家听了面面相觑,他们低声交谈后,一位先生开口解释:“我们的工作 is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program design(意为软件开发和程序设计)。”大陆专家哄堂大笑,原来台湾称“程序设计”为“程式规划”,让大陆专家误会成“城市规划”了。

词语差异不仅带来误会，书写合同、协议、备忘录时，还增加了很多繁琐和不便。刘青说，他们曾经签过的协议中有这样一段：双方愿意在计算机(电脑)名词审定方面进行合作，甲方负责完成程序设计(程式规划)，建立术语数据库(资料库)，最后将磁盘(磁碟)交给乙方。短短一句话竟加了4个注释。

### 曾经，有人为编词典卖栋房子

两岸语词差异早就引起相关人士的关注。1993年“汪辜会谈”达成的协议中，就包括探讨两岸科技名词统一的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接受一家媒体访问时曾指出，海峡两岸分离将近半个世纪，有很多重要事项要谈，而在第一轮会谈中就把两岸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列入协议，可见这项工作的重要。

也因此，1994年，“科技名词委”把两岸科技名词的交流、对照与统一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明确方针、政策、任务及办法。此后，两岸两会因种种原因对话中断，但两岸专家学者统一科技术语的对话从未中断。1996年，“科技名词委”与代表台湾的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的专家们进行了座谈，确定了合作方式。同年6月，两岸天文学名词对照研讨会在黄山召开；7月，两岸航海科技名词研讨会在台湾举办……自此，数百位两岸专家先后召开了数十次科技名词研讨会。即使2000年后台湾政治环境发生改变，两岸专家们工作经费少了，大家仍然坚持继续沟通协商。

两岸常用词语交流，也曾经面临同样困境。在北京朝阳门南小街一栋简陋的小楼里，两岸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大陆编委会词典编辑组组长李行健，从书柜里拿出两本厚厚的词典，由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与北京语

言大学共同编纂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大陆版出版于2003年，台湾版出版于2006年。

李行健曾是《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的主编之一。回忆起当年的编写过程，李行健说，因为是民间合编的词典，经常编着编着就没经费了。他还透露，为了筹集经费，中华语文研习所创办人何景贤，不惜卖了一栋房子，大概筹了几十万美元。可惜，这本词典面世时，正是台湾“去中国化”大行其道之时，词典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当然，李行健说，因为编写环境、条件都不同，相对于这本词典，即将出版的《两岸常用词典》更侧重两岸语词的差异，词典编辑环境更宽松，条条框框更少，收词的眼界更宽，注释也更与时俱进。

### 协商，彼此避免让对方为难

编词典的人常讲一句阿拉伯谚语：上帝要惩罚谁，就让谁来编词典。编词典苦，编纂两岸词典更苦，因为还要费尽心力克服两岸特有困难。

李行健介绍，《两岸常用词典》仅称谓用字就很费了一些脑筋。台湾称自己使用的字是“正体字”，难道大陆的简化字“不正”吗？大陆称台湾用的是“繁体字”，可是台湾专家表示，他们用的是传承下来的汉字，哪有“繁体字”一说？台湾称大陆用的是“简体字”，这也不准确，因为大陆经过简化的只有2200多字，约占通用汉字的1/3，怎能一揽子称为“简体字”？最终，因为台湾曾将整理过的汉字称为“标准字体”，大陆则将整理简化过和汉字称为“规范字形”，两岸专家协商后达成共识，词典大陆版称为“规范字形本”，台湾版称为“标准字体本”，如此皆大欢喜。

遇到敏感词，李行健说，“双方会友好协商，彼此都避免让对方为难”。比如说，关于“儿童节”的解释，台湾专家初稿写：“1934年中国政府确定为4月4日……大陆定为6月1日。”“‘中国政府’与‘大陆’出现在同一个词条中，有‘两个中国’之嫌，我们较难接受。最后，这个词条改为先介绍儿童节是什么节日，最后标明大陆定为6月1日，台湾定为4月4日。双方都可接受。”

李行健还举了一个“少数民族”的例子，台湾的少数民族习惯分为14个族群，而在大陆则通称为“高山族”。为了能够完整描述词义，最后，《两岸常用词典》将大陆少数民族与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列出附表提供给读者。他说，在词典编写过程中，两岸专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无法达成共识的，就等待进一步交换意见，直至形成统一意见。

### 交流，化异为通到化异为同

李行健认为，了解彼此差异，求同存异，而后化异为通、化异为同。就常用词来说，伴随两岸交流交往的深入，有些词已经两岸通用了，比如大陆的“山寨”“大腕”，台湾的“伴手礼”“便当”。有些词甚至难分彼此了，比如“激光”和“镭射”“信息”和“资讯”“软件”和“软体”。“你用我的词，我用你的词，到底用什么词表达，由老百姓的语言实践来决定，最终促成民族共同语向规范统一发展。”王铁琨说。

科技词语则是“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已经各自公布的老词，要承认既定现实，新词尽可能一起协商决定。”刘青举例说，台湾称“天文物理学”，大陆称“天体物理学”，两岸都觉得对方起的好。不过，“天体”在台湾有“裸体”的意思，大陆的“天体物理学”也已约定俗成。虽

然不能改变，彼此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了。

老词不便更改，新词却可发于机先。刘青讲了一件愉快往事，2007年6月，两岸天文学名词对照会前夕，国际天文学组织对一颗矮行星Eris及卫星命名。Eris是希腊神话中的纷争女神，两岸天文学家各自拿出几个备用方案，会上双方热烈讨论，最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共同将Eris定名为“阋(xi)神星”。

刘青还介绍，元素周期表中1997年后发现的新元素，两岸通过预先沟通，最终确定了同一名字，所以第101号至112号元素在海峡两岸有相同的中文名字。目前，大气科学的新名词两岸一致率高达90%以上。刘青说，2006年10月，第四届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重点对新名词进行了研讨。会前，两岸天文新名词只有38%是一致的；会后，一致率提高到80%。最近，因为新名词的增加，两岸大气科学新名词一致率再提高到90%。

从去年开始加入词典编写队伍，王铁琨说，“越编体会越深，消除两岸词语差异，其意义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因为语言沟通，不仅关涉到两岸文化的交流、经济贸易的繁荣，而且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志，语言对于加强民族认同、传承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语文工具书首席顾问许嘉璐撰文表示：“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秉承在这次实践中充满着珍惜、尊重、真诚、友爱的精神，就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拦阻我们的合作和交流，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能解决。”除了传承中华文化、促进两岸交流，还可为未来解决两岸问题提供经验，也算是两岸合编词典意义非凡的副产品吧。



# 西安火车站

西安站始建于1934年12月,1935年6月正式运营,时为客货兼营一等站,站名为西安车站。1937年西安车站更名为长安车站,1952年1月1日恢复西安车站名称。1984年西安车站改建工程开工,1985年12月31日西安车站新建站舍主楼竣工,1988年8月1日西安车站由一等站升格为特等站。1990年10月1日车站东配楼售票厅和办公楼竣工交付使用,至此西安车站新站改建工程全部完成。2005年3月18日成立西安铁路局,西安车站划归西安铁路局管辖,不再归郑州局管辖。



西安火车站位于西安市新城区环城北路,解放门以北、西安城墙北临。西安站是陕西省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站前和站东、西有诸多公交车的经停站与起点站,以及陕西省西安汽车站。西安站主要担当陇海铁路、西康铁路、宁西铁路、西侯铁路、包西铁路等旅客运输任务。是陕西和西安的窗口,素有“陕西第一窗”的美誉。

## ·解字·

### “尧”



《三才图会》中的尧画像



“小臣持献寿,长此戴尧天。”这个“尧”字本为会意字。甲骨文①的上部是两堆土,下部是面朝左的一个人,“土”本身就有“高”义,再架于人之上更有“高”义。②是《说文》中的古文形体,是两个“人”的头上均有“土”。③是小篆的形体,人的头上有三堆土,极为复杂。④是楷书繁体字。⑤为简化字。

《说文》：“尧,高也。”“尧”字的本义为“高”。人中之最高明者为“尧”。所以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史称“唐尧”,也是古代传说中最贤明的帝王。杜甫《诸将五首》：“蓁门何处尽尧封。”这里的“尧封”就是指中国的疆域。据说尧、舜时开始划定我国疆土为十二州,所以后世也常常把“尧封”当成中国的代称。

总之,古代人民对“尧”极为崇拜,所以古籍中的“尧天”“尧年”等词,都用来比喻理想中的太平岁月、升平盛世。

##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二)

# ——金光门

金光门,隋唐长安外郭城西面中门,遗址在今西安西郊李家庄西北约 130 米处。

### 1.金光门内汉圆丘坛

金光门内北侧的居德坊,有汉圆丘坛余址。

汉圆丘为西汉天子祭天之坛。古人根据“天圆地方”之说,筑祭天之坛为圆形土丘,故称圆丘。汉武帝元鼎五年(前 112 年)在甘泉(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立泰一祠以祭天,并于元鼎四年在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置后土祠祭土地神,这是汉武帝至汉成帝八十年间,西汉诸帝举行祭祀天地之神活动的主要祠坛。

汉成帝即位之初,宰相匡衡上言说,甘泉泰一祠位于汉长安城之北,不符合“祭天南郊,就阳之义也”的古制;汾阴后土祠在汉长安城的东方,也不符合“瘞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的古制。汉成帝遂于建始元年(前 32 年)十二月罢甘泉、汾阴祠,分别在都城汉长安城南郊建圆丘坛和北郊建后土祠。《三辅黄图》卷五:“汉圆丘,在昆明故渠南,有汉故圆丘,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又《长安志》引《括地志》:“汉圆丘在长安治内四里,居德坊东南隅。”汉圆丘余址约在今西安西郊丰登南路的北段。

### 2.隋炀帝金光门外杀斛斯政

斛斯政,隋河南人。大业八年(612 年)官兵部侍郎。次年,杨玄感起兵谋反,与之通谋。杨玄感谋反失败后,斛斯政惧炀帝治罪,叛逃至高丽(今朝鲜)。

大业十年(614 年)七月,高丽王遣使请降,并将投奔其国的斛斯政锁还。隋炀帝遂由东征高丽途中的怀远镇(今辽宁辽中县附近)押解

斛斯政班师回京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在议如何处罪斛斯政时,时有左羽卫大将军宇文述上奏说:“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忿。若同常刑,贼臣逆子何以惩肃,请变常法。”炀帝遂命用酷刑,于同年十一月丙申(二日),“将政出金光门,缚政于柱,公卿百僚并亲击射,裔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后烹煮,收其余骨,焚而扬之”(《隋书·斛斯政传》)。

### 3.金光门内上官昭容宅

金光门内南侧的群贤坊东南隅,临近金光门,有上官昭容地居宅,宅址约在今西安西郊丰登南路南段路东。

上官昭容(664~710),名上官婉儿,唐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人。上官仪孙女。初生,祖、父下狱死,随母没入宫中。聪明善文辞,明习律事。武后爱其才,使参决百司奏表。中宗复位,益加宠信。景龙二年(708)由婕妤拜昭容,专掌制令。私通武三思,每下制敕,则尊武抑李。后于李隆基政变中诛韦后时被杀。

### 4.裴明礼金光门外置果园

唐长安城中,不仅有许多官家果园,如大明宫的杏园、樱桃园;禁苑中的梨园、桃园、葡萄园、石榴林;昌乐坊中专供皇室梨花蜜的果园等等,而且也有一些私家果园。所产果实都在城中出售,获利都很大。如唐初贞观时,有一位家住长安城的河东人裴明礼,是收破烂的,“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后来他在金光门外购置一地,“舍诸牧羊者粪,既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太平广记·治生》)

## 回望百年西安易俗社



在西安,民国的遗迹当数陕西易俗社,只是知道它的人很少。易俗社全名“中华民国易俗社”,学生排名亦如富连成、荣春社等,也以班社名称次序命名。易俗社系一“旧瓶装新酒”小小秦腔科班。1957年,田汉同志就易俗社说:“现在世界上具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剧团只有三个,一个是法国芭蕾舞剧团,一个是苏联的莫斯科大剧院,还有一个就是易俗社了。”

1962年8月,西安各界隆重开会,纪念易俗社成立50周年,盛况空前。转眼间,又过了50个春秋,今年8月,是它的百年大寿。

### 易俗社里多巨头

易俗社成立于1912年,它的成立,在中国戏曲史上是开先河的事件,近一百年来,国内没有一个戏曲团体可以与它的光辉历程相匹敌。

易俗社最初是革命军动用9000两银子的军费建立起来的,所以与军界关系特殊,民国陕西首任督军张凤翔曾下令教育司,每月拨银三百两补助易俗社。故易俗社在经济上得天独厚,这是它与京班不同的一大特点。所以在后来的数十年中,它在政治上十分敏感。

易俗社的干部多政治人物,比如,首任社长杨西堂是当时的省议会议长和东征军的后勤部长,既有财权又有政权。再比如,创始人之一师子敬,是国会议员,并且还是秦丰银行的

总办。副社长耿古澄、剧务主任王绍猷等,早年曾在革命军中任过旅长。而后来的名誉社长张钫,是辛亥革命中陕西新军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抗战后被授陆军上将军衔,他出身行伍,却喜欢戏曲和金石字画,所搜集的唐代墓志占我国收藏唐墓志总数的一半,他不仅扶持了易俗社,还曾利用他的影响维护过流落西安等地的豫剧班社,陈素真、常香玉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关照。

### 张自忠将军亲自托付

1924年,鲁迅先生到西安讲学,五次光临易俗社,并赠“古调独弹”匾额。鲁迅先生对易俗社创始人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范紫东及吕南仲等人的学问、操守非常推崇,引为同道。

1936年12月,易俗社曾参加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领导的“西安事变”。

1937年,易俗社应宋哲元将军电请,于6月6日到北平(今北京市)前线慰问守军。当时北平危在旦夕,易俗社慨然北上,演出了《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

该社剧作家封至模被尊为“秦腔齐如山”,他当时在北平《京报》上撰文,谈他编写《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的意图,说:希望不要把它当作过去的历史看……一个国家或民族,到了被外族侵略、国将不国的时候,总有几个大或小

的汉奸，媚外卖国，将领土拱手送人……观此而不扼腕而叹，奋臂而起，是无人心也……我们只有大声呐喊：“《山河破碎》了，《还我河山》吧！”

7月底，29路军撤出北平，易俗社随军行动不便，只好留在沦陷的北平，张自忠将军亲自出面安排，为解决其生计，29路军拨出专款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张将军还特别托付“三会”（梨园、商会、教会）护佑，最终易俗社安全撤回西安。

### 总共编了500多出戏

易俗社一直以“开发民智、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范紫东等先生不仅是辛亥革命的战士，且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

戏曲界近来流行一句话，叫“出人、出戏、走正路”。论“出人”，易俗社在解放前37年中，有600多名学生分布西北五省戏曲重地。论“出戏”，在这37年中，竟编写出秦腔剧目500多本，不乏传世佳作。在这些剧目中，仅李、孙、高、范等人的剧作就占了半数以上，易俗社高产作家首推孙仁玉，他创作的剧目多达140余种。

易俗社历任社长中，高培支任职最长，三上三下，一生创作剧本近50种，在描写世态人情方面有独到之处。

范紫东是易俗社成就突出的作家之一，创作大小剧目68种，他创作的《三滴血》曾拍成电影，两度轰动北京舞台。

旧北京有句话，叫“与人不对，拴班起会”，意思是要害谁，就劝他组织戏班和堂会，时间长了，准叫他倾家荡产。清末北京的王府因拴班起会而败家者，颇有人在。戏班经营艰难，为

此，易俗社《章程》规定捐助千元以上者，即可被选为名誉社长，千元以下者，亦给各种奖励和荣誉。因为没解决好经济问题，荣春社、鸣春社等京班后来都先后关门，而易俗社虽几度面临绝境，却顽强地生存下来。

### 在“西安事变”中立功

在“西安事变”中，易俗社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赵寿山将军回忆，12月8日，张、杨商定扣蒋，12月9日却发生一场误会，特务营长宋文梅误以为要提前行动，当时张学良、杨虎城正陪南京来的军政大员在易俗社看戏，他们利用精彩的剧目，转移了对方注意力，及时平息了事端。12月9日当天，杨虎城的指挥位置就设在易俗社。

12月11日，杨虎城又请蒋介石侍从人员在易俗社看戏，他们回临潼时已半夜，不到3小时，便发生了“事变”。易俗社两天八小时的盛大演出，起到了“掩人耳目”的作用。

在张学良的手下，蒋介石也有坐探，比如曾护情，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蒋介石手下“十三太保”之一。西安事变前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名义上是张学良将军的部下，实际上暗中监视，可连他这样的情报老手都被瞒过，可见易俗社的贡献确实不小。

遗憾的是，这一史实在许多有关易俗社资料和研究文章中均未提及。《易俗社七十周年编年纪事》仅在“1936年12月”条目下有“赵松崖新编《左宝贵》、刘迪民排、宋钟华等演出”的记载，可能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已被销毁。

易俗社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剧目和演员的名气不仅誉满三秦，在国内戏曲界也是劲旅。今天看来，利用易俗社掩护军事行动，是一步妙棋。



# 周至二曲礼仪

(富小云 整理)

二曲礼仪，是指传播于周至县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种古老的仪式。它源于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李二曲，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名颺，字中孚，号二曲，周至县城西郊蔡园堡人。二曲礼仪的实质是继承儒家传统礼仪，躬行关学“以礼教为本”。它是儒家传统礼仪与周至本地民俗相结合的产物。主要体现于周至民间的红白喜事活动中，以表孝意、表敬意、表庄穆、表隆重而举行的礼节仪式。二曲礼仪，主要是通过师徒传授的方式，传承下来。用于百姓家的婚嫁、寿诞、丧葬、三周年、节庆等红白喜事。

二曲礼仪的主要内容有六项：**1. 执礼者**(即礼宾、司仪)：是礼仪的主持、赞礼者。唱赞仪式、叫人行礼。礼宾由二、四、八人组成。分别称：启赞、通赞、引赞、哑赞。**2. 受礼者**(接受礼仪的对象或偶像、牌位)。**3. 行礼者**(主祭者)：是参拜受礼者的主角，行使鞠躬跪拜礼。**4. 祭品**(献的物品)：祭品要新鲜、要丰盛，且为祭祀神明的专品。用于祭祀的牺牲与物品都有雅称，不得直呼其名。**5. 礼文**(祝文、祭文)：是拜祀神明时所用的文体，即祭时以言告神、

祈福致祷、祈祷雨晴、驱逐邪魅、干求福降、哀悼死亡之辞。体裁有散文、韵文、骈文等，韵文中以四言为正体，感情色彩浓厚。**6. 仪注**(仪式、程序)：主要介绍二曲礼仪的《祭礼》。祭礼，是一堂正礼、大礼。无论婚嫁、寿诞、丧葬、节庆等活动，是日之先夕，均要行庄重、典雅、正规的《祭礼》。

其基本仪式和程序为：**①陈设**：凡祭，须先陈设。在神龛前，设供桌、置蜡台、摆香炉等。且稳案、净几、盥洗、燃烛、焚香。**②请主**：打扫庙堂、陈设就绪之毕，请进尊神，即请出受礼者(或龛、牌位、偶像)，安座。**③降神**：行裸礼，进爵灌地，即以酒洒地，降神受飨。**④省神**：看望、问候神主。**⑤致献**：奉献应献的祭品等，恭读《祭文》。**⑥侑飨**：以乐劝食。**⑦参神**：大礼参拜。**⑧焚化**：焚烧纸钱、金帛等。**⑨酌酒**：将酒奠洒于地。**⑩辞神**：祭礼结束，辞别之大礼。祭礼时，站立要恭谨、垂首弯腰。祭前要斋沐，长幼毕集，亲疏秩然，举止有度，中规中矩。

2007年5月，二曲礼仪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被确定为西安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 文景之治是如何“治”的



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文帝、景帝实行维护社会安定与民休息的治国战略，社会经济文化出现初步繁荣，国家进入一个升平的时代。

西汉初期，经济萧条、人烟稀少，一片荒凉。经过刘邦吕后的初步治理，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公元前 180 年汉文帝刘恒做了皇帝以后，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农天下之大本也”，“道农之路，在于务农”，文帝亲自下田耕作，给各级官员做出榜样，人民受到很大鼓舞。汉文帝下诏“弛山泽之禁”，属于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允许农民开荒耕种。内地的土地耕种面积不断扩大，沿海地区的盐业资源得到了开发。文景二帝还采纳了晁错提出的“贵五谷而贱金银玉”的主张，鼓励富人高价购买农民的粮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轻徭薄赋，降低田租税率，由汉初十五税一降到三十税

一，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田税最低的时期。到国家有了一定的积累时，长达 12 年免除田税。打击豪强和不法商人对农民的盘剥。为农民建立了平稳的生产环境。农民有了足够的生产时间，农产品日益增多。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是看这个国家财政收入多少，而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富裕程度。

“文景之治”时期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大多数富起来。

提倡节俭，严禁浪费，这是文景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帝在位 20 多年，宫室园林，车马侍从，均无增加。他曾想做一个露台，预算下来，要百金，便放弃了。他不断减少自己的开支，从不接纳地方送来的礼品。下令各级官吏“务省徭费以便民”。作为一个皇帝，经常穿较粗糙的衣服，夫人宫女也不准穿拖地长衣。帷帐不准用贵重的丝织品，以免带起奢侈豪华的风气。文帝提倡节葬，下遗诏在他百年之后，治丧期不准影响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不准用贵重的东西陪葬。由于文帝节俭，国家的开支缩减，官僚贵族多不敢滥刮民财、铺张浪费，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社会上出现了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的局面。

社会财富占有的悬殊，是社会不安的最大隐患。文景二帝为改善“尊农夫，农夫已贫

贱”的社会状况,除了采取“损有余补不足”的措施外,对于奢侈的贵族以及私自铸钱的诸侯,严惩不贷。下令列侯就国,防止诸侯干预朝廷,削减诸侯割据势力。梁王刘武,是最大的诸侯,而且是皇帝的亲弟弟,窦太后的亲儿子,想长期住在京城,景帝均不允许,叫他回到自己的封国去。

法律是治国的大事。自秦国实行严刑峻法的政策以来,法律日益残酷,像连坐法,一人犯罪株连亲族,一杀就是几十人,甚至几百人。还有肉刑,如割鼻、断足等。残酷的法律没有给秦国带来安定,很快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中土崩瓦解了。文帝认为,这种法律是残暴的行为,不利于治理社会,法律公正,人民才会诚实,判罪恰当,人民才会服从。各级官吏不能引导人民走正道,又用不公平的法律去治罪,只能造成社会更加混乱。在文景时期,连坐、肉刑基本废除了。提倡严格依法办事,犯人不屈,要允许申诉,重新评议,保证了法律的公正性。

恭谨从俭是文帝刘恒开明政治思想的体现,中国古代就有“进善旌”“诽谤木”的说法,就是把不同意见写在旗上或木头上。这反映古人

要求言论自由的愿望。秦国就制定了“诽谤妖言”罪,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只能遵守不能议论,议论就是犯罪,轻则发配,重则砍头。商鞅变法时,就不准人民议论,不少人因议论掉了脑袋或发配到边疆做苦役。这种防民之口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汉文帝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历史的教训,汉文帝认为要寻求治国的好办法,必须大胆使用进谏人,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汉文帝要求各级官员直言纳谏:“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汉文帝认为,一个皇帝的德行十分重要,自己的德行好坏,直接影响百官,百官的德行好坏直接影响民众。百官出现了错误,皇帝脱不了干系。文帝这种宽大的胸怀,开明的政治思想给汉王朝带来新鲜空气,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初探。汉景帝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教育,学术上允许百家争鸣,他深爱贤士,常把学术有成的人召进宫里讲学,还提倡多办学校。文景时期不论官学还是私学都有很大发展。

文、景二帝对周边和民族地区采取和平共处的弭兵政策,对北方的匈奴和亲、通商,对南方蛮夷实施安抚,使他们归顺朝廷。边疆多年没有战事,为中原地区发展经济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家也扩大了积累。

文景之治给国家带来富强,社会带来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文景之治虽然过去 2000 多年了,但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从中会得到很多的启发。

文景之治到底为谁治?一句话概括就是“为国为民”。文景之治到底治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治奢、治军、治霸……贵粟积贮,孕育盛事。



# 古代科举 对官宦子弟的限制



明万历八年(1580),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考中状元,同时考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大儿子张敬修。消息传来,舆论哗然,众议嚣嚣。原来,就在3年前,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已考中了榜眼。张居正有六子,有人为此作诗讽刺:“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做探花郎!”无怪时人的非议,因为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时人讥之“一鸾(借指翟銮)当道,双凤齐鸣”,翟銮也因此被弹劾“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而同样,嘉靖的做法亦非没有先例。早在北宋雍熙二年(985),宰相李昉之子、吕蒙正之弟本已取得殿试资格,但宋太宗却提出,“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竟不许二人参加殿试。

从隋唐创设科举制度,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中,

关于官员子弟的应试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争论的焦点。应当说,官员子弟由于环境的熏染,对于政治难免会有比一般人更强的敏锐性和适应性,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他们在科举考试乃至仕途发展上有较好表现,应当也属情有可原。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情况却是,相当一部分官员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而是倚仗父辈的权势实现金榜题名乃至平步青云,这实际上也是对寒门子弟在政治权利上的另一种剥夺。也因此,不少人有意识地将抑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掖寒士、体现公平的一种手段。如唐代王起主持考试时,明确提出“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的状况。到了宋代,更专门创立了“牒试”制度,规定官员子弟、亲戚、门客须专送别处考试。康熙时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参加考试单独编字号,规定取中名额,以实现“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



路”。

尽管如此,纵观科举史,官员徇私、子弟舞弊的现象从未断绝。甚至前面所说宋代“牒试”制度,原为约束官员子弟应试,但在实际中却演变为对官员子弟的特殊照顾。而这也正是官员子弟受到人们质疑的客观基础。其实,张居正也并非不清楚他的三个儿子中试所引起的社会非议,对此他辩解说,“国家既然独重进士一科,则大臣子弟纵使有卓犖奇伟之才,若不参加科举考试,终不能进入宦途,为国家贡献才能。因此,人们所说大臣子弟不应与寒士争功名,在前代或许可以,在如今就不适用了”。张居正的辩解看似不错,但实际上却是在偷换概念,因为人们反对的并不是官员子弟应试本身,而是愤慨于他们以权谋私徇私舞弊的行为,而对于那些洁身律己者,人们只会报以敬意。这里不妨以曾国藩两个儿子的应试经历作为比较。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被曾国藩评价“天分甚高”,但时运不济,三次参加会试皆未能中,在这过程中曾国藩不仅没有为他打过招呼说过情,反而在

曾纪泽心生厌倦提出退出科场转攻西学时,慨然表示同意。后来曾纪泽凭借自己的努力,终成晚清著名外交家。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第一次到长沙参加乡试时,曾国藩已然节制东南半壁江山,位高权重,然而他却在考前写信给曾纪鸿,告诫儿子“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发榜之前再度致信曾纪鸿“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自然,曾国藩也从未就曾纪鸿应试一事向主考官打过招呼。那次考试曾纪鸿最终名落孙山,以后尽管多次应试,也未能考中进士。

总之,古代科举制下,人们对于高官子弟应试的关注,实质上是对权力滥用的担忧。而解决这一问题,不外乎以下几种手段:一是权力拥有者的自我约束,二是更高一级的监督,三是制度的制约,四是社会舆论的监督。考虑到如前所说,权力的一大特性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钻空子、搞腐败,这四种手段必须同时运用,才能构筑起防范权力滥用的“防火墙”。如今公务员在录用、晋升上大多运用了

了考试这一方式,而另一方面,关于官员子弟“萝卜招考”“内定应试”的新闻不绝于耳,甚至引起人们对于“官二代”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重视增强考试的公开、公正、透明,避免原本为促进阶层流动的这一制度设计演变为所谓“拼爹”游戏,让那些出身寒门者拥有平等地站在考试这一起跑线上竞争的权利。



# 民国时文人的日子

1934年1月11日，闻一多在一封写给友人饶子离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个孩子的家庭已经够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给家里寄四十元，给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况更是一言难尽，我若不寄钱去，一家人就得饿饭——真正饿饭。总之我自己虽困难，守着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总算是一条生路。”

陈学昭 1922 年入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同学中不乏有钱人家的女儿，如一个京剧名角的两个妹妹，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等，她们上学放学，都是小汽车接送。

抗战胜利后，作家黄谷柳到香港谋生，一家六口在九龙联合道租了一间不及 4 平方米的小屋，只摆了张床，没有桌椅。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不时哭啼，黄根本无法写作。屋外走道的一端是房东安放的一个“神位”，刚好可以放下一个小板凳，黄谷柳的妻子便用一捆木柴和邻居换了一个肥皂箱，黄就是在肥皂箱上写成了名篇《虾球传》。

抗战爆发后，战火蔓延至丰子恺的家乡，他被迫逃离刚落成不久的“缘缘堂”。后有信传来缘缘堂已焚毁于战火。丰子恺一家十余口在逃难中互诉损失的家当。有人可惜衣橱里的许多衣服，有人可惜满堂新置的家具。他的一个女儿说：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另一个男孩说：秋千架和新买的脚踏车最肉痛。丰的妻子则挂念她房间里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瓷器。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一日，齐白石前来造访，称无米下锅，无煤取火，请求救济。李宗仁也无良策，只能从行营人员的配额中酌量拨出一部分给了齐白石。齐因此对李甚为感佩，认为李宗仁能礼贤下士。他特地画了一幅寿桃，送给李宗仁夫妇。后来李定居美国，这幅画一直挂在他的客厅。

民国初年，上海滩靠卖文能买得起汽车的，唯毕倚虹一人。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坛富翁当数邵洵美和徐志摩。邵是豪门之后，继承了大笔遗产；徐则是大学教授中唯一有私人汽车的人。

北平时期，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大体为 360 元，所谓庚款教授多达 450 元。陈垣教授除日常收入外，还四处兼职，每月能挣上千块。

民国初年，张元济家的浴室里已装有煤气热水炉，点燃后 20 分钟即热。此外室内还装了一个类似水汀（暖气）的煤气炉，便于冬天洗浴。张元济规定，每星期全家洗一次澡。1934 年，张元济的女儿出嫁。她向家里所提嫁

妆仅家具就要四套,包括卧室、客厅、餐室和书房。此外还提出要冰箱和汽车两大件。这在当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而张元济当时已退休,商务印书馆两年前因战火遭巨创,张家家境远不如前。父母为满足女儿的心愿,只能东拼西凑。张母连操心带忙累,事后一病不起,不久即离世。

袁世凯的某个儿子在燕京大学念书时,不住宿舍,公馆安在海淀。他每天包车去上学,佣人跟着,等在教室外,课间休息时,佣人要递擦脸手巾、香片茶、三炮台烟。

《罗曼罗兰传》的译者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在北平中法大学当教授,另在孔德学校兼课,月入 300 元上下。鲍家住两个小院,共八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家里有客厅、书房、盥洗室、浴缸、厨子、女佣以及自己的包月车。书房里四壁书架陈列着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

老舍小时候家里穷,小学毕业时,每人要交两张照片,他家掏不出照相的钱,后来卖了一个破箱子,老舍这才算毕了业。

20 世纪 30 年代,熊十力是北大名教授,住沙滩附近,独居。屋里一目了然,一张木板床,被褥等不仅旧,而且脏和破。没有书柜,书都堆在一个破旧的架子上。屋里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的,几近朽烂,另一个是铁皮的,底和盖竟然不是一回事。

杨丙辰在北大西语系任教时,每月领到薪水,都要端坐在教员休息室的书桌前,一边在一张纸上写数字,一边把钱分成几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答:怕报假账露了马脚,必须先算清楚。又问他为什么要报假账,他再答:每月要给穷朋友一点钱,怕家里太太

知道了不高兴,要找理由瞒哄过去。

《京报》老板邵飘萍生活奢侈。他是中国新闻记者乘私人汽车外出采访的第一人,当时北洋政府的许多总长还只备马车。他抽的烟是请烟草公司特制的,烟盒上印着“振青制用”的字样。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之家的生活与清华北大时期已有天渊之别。教授夫人除了当家庭主妇,还得充当一些为糊口而为之的角色。联大主要负责人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自蒸“定胜糕”卖,她后来回忆:“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梅贻琦字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吴晗曾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1942 年底,茅盾路过贵阳,去文通书局访总编辑谢六逸,谢不在。茅盾从其同事处得悉,谢六逸在外兼职达五六个之多,每天要在马路上奔波两三个小时。以谢六逸的个性,是不喜欢多兜揽事情的,因而茅盾判断其子女多,经济状况一定不佳,不得已才四处兼职,以养活一大家子。第二天谢到招待所回访茅盾,叹道:“在贵阳一住五年,实在寂寞得很。”

20 世纪 30 年代,罗尔纲随胡适来到北

平,供职于北大文科研究所,月薪 60 元。他把妻儿从广西接来后,租了一间小房,因接送儿女上学,不得不包下一部黄包车,这样一来,一家四口最低生活费也要 90 元上下。罗便卖文以补家用。他说:“当时我的工作分成了三方面:考古室办公时间做整理艺凤堂金石拓本的工作;星期日及假期到图书馆去继续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晚上回家却在荧荧煤油灯下赶写太平天国史文章,常常写到午夜不得休。”

1917 年,徐悲鸿夫妇在北平等着出国的一段日子过得很苦,蒋碧微后来回忆:“自从到了北平,我们一直很穷,徐先生通常都在北大吃饭,或者是参加应酬,碰到家里青黄不接,他也多半不大在意。有一回我身上只剩下了两个铜元,折算起来还不到一分钱,正在发愁,程妈来说先生不在家吃饭,我们马马虎虎买半斤面条下了吃吧。我问她半斤面条要多少钱呀?她说四个铜子。我一时拿不出来,只好叫她先垫付一下。第二天逼得没法,想拿母

亲给我的一只金镯子去当掉,但是徐先生不肯上当铺,他的理由是一个男人拿着女人的首饰去当,人家会怎么想呢?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一出门就是后门大街,大街上有当铺,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帘,我在门口梭巡许久,一方面缺乏勇气,一方面又怕熟人碰见,最后我想起不进去不行。这才在四望无人的时候,一头钻进了棉布门帘,抬眼一望,当铺柜台比我的人还高,我举起手将金镯递给朝奉,他接过掂量一下,说是可以当四块钱,我一声不响,拿了四块钱和当票就回家。”后来这金镯子还是被徐悲鸿赎了回来。

蒋碧微说:“我和徐先生结缡(编者注:古代嫁女的一种仪式。女子临嫁,母亲给她结上佩巾。语出《诗·豳风·东山》:‘亲结其缡。’后即以‘结缡’指结婚)二十年,生活过得一直很苦,日本、北平和巴黎的困窘不谈,回国以后徐先生的名气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从来没有卖过一幅画,倒是他收购金石书画的支出,反在渐渐的增加。他每个月将薪水交给我,我却要匀出一大部分去支付他收买艺术品或是裱画的费用,因此回国那么些年,我们不但没有储蓄,甚至经常捉襟见肘。”

彭素民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总务部长、农民部长等要职。彭虽居高位,却“未尝为家谋”,1924 年病故后,“家贫母老,子女六人俱幼弱,教养无资”。后经廖仲恺等努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决,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 1000 元并每月 100 元的定期补助,至其子女成人能负担家庭生计为止。



徐悲鸿作品

顾维钧的续弦夫人姓黄，是南洋糖业大王的女儿，顾继承了岳父的巨大遗产。他在北京任代理国务总理时，公馆每月开支多达4万元，都由自己支付，从不动用公款，更无贪污之举。

林白水成败皆因办报。他最风光的时候，家里有十个佣人，五个家庭教师，住着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房子。平时出手之阔绰，常令人叹止。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当管理员时，月薪是8元。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大概能挣400元，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北大教授的工资都在二三百元之间。

上世纪20年代末，柔石闯荡上海滩，靠卖文为生，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他在一封家信中说：“现金每月收入约40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20元。又一家杂志，约20元至30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25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多少钱。”

丁玲和胡也频同居后生活拮据。一次两人还剩一块钱时，有客人来，只好用这一块钱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时他们住在北平郊区的碧云寺，第二天一早起来，两人两手空空，徒步几十里地进城找熟人借钱。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30年代中叶北平的中学名教员，收入一般在150到200元之谱，大都有辆包车，夏天晚饭或饭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园、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点钟回家睡觉。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树下支开桌子，吊上电灯，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轮流做东，更是家常便饭。牌桌

上一夜下来，擦把脸、吃点东西来校上课、改卷子，是常事。”

“左联”作家的生活与名气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联领导人周扬，也经常靠举债度日。胡风回忆说，有一天早晨，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声调很急切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元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经常。”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但家里没钱送产妇进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天，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局面直到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周扬得了大约800元稿费，生活才有所好转。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给鲁迅算了一笔账，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共计收入为国币7万多元。平均月入700多元，这大体是当时一个名牌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于20世纪末的人民币两万多元。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自然是越搬条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迁居环境更幽静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他在《病后杂谈》中也算了一笔账：“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下转第15页）



## 毛泽东评点 《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毛泽东之所以对《红楼梦》爱不释手，是因为它是中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名著之一，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还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由此可见，毛泽东把《红楼梦》作为与外国文学名著相媲美的文学作品。

毛泽东经常说，《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社会史料，而这些丰富的社会史料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反之，只有深入社会生活，总结社会经验，才能写出有生活气息的不朽的文学作品。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艺演讲时说，《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

战争的，《红楼梦》里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通过这些话，毛泽东要求“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号召文艺家贴近生活，丰富实际经验，充实内容形式，创造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以古喻今，吸收《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现实服务，也是毛泽东的独到之处。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把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比喻为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软弱香”，会有目的地向延安送，告诫党员要警惕“软弱香”的坏影响；还将我们的宣传比喻



为带刺儿的玫瑰花,自由资产阶级不喜欢,他们只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告诫党员干部在革命中要不怕自由资产阶级带来的麻烦。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毛泽东把蒋介石集团议和的条件“军队有确实的保障”,比喻为“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名为和平实要战争”的实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评判国际政治态势时,借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比喻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963年,当时中国既要面对美国,又要防备苏联,针对有人担心美苏合作对我不利的估计,毛泽东说: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还是

《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谈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时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及选举、文教、学习方面的问题都要协商。比如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协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论问题。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以后也还有。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两次引用了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希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要具有大无畏精神,敢于向共产党提出批判建议,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引用《红楼梦》里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说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苦战与修整的对立统一,要讲究辩证法的。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说,从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过360多年的发展,建立起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17世纪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灭亡的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代。由于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下转第45页)



## 奥运奖金知多少

会低于北京奥运会金牌 35 万元、银牌 20 万、铜牌 15 万人民币的标准。除此之外,各级政府及基金会的奖励才是重点。以北京奥运会体操“三金王”邹凯为例,香港英皇集团奖励 72 万;曾宪梓体育基金奖励 150 万;霍英东体育基金会向金牌运动员奖励 1 公斤黄金打造的“金牌”和 8 万美元现金;还有四川省奖励 150 万,泸州市奖励 300 万及温江一套近 200 平方米的房产,价值 120 万元。由于对每一位冠军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固定奖励模式,所以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奥运会每一位夺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收获的奖金不低于 300 万,甚至还有更高的,比如五粮液集团宣布的首金奖励 1000 万。另外,中国代表团赞助商宝马还宣布每一位奥运冠军可以半价购买宝马 X6 汽车一台(价值 100 万至 150 万之间)。另外,国家还有相关法案,运动员获得的奖励免征个人所得税,甚至还享受终生津贴,比如前一段时间爆出新闻的羽毛球运动员黄穗,虽三年没有上班,但照样领取“空饷”。而这一切还局限于奖励范畴,还没有算上企业代言的商业收入。

2012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为奥运金牌选手开出了 10 万欧元国家奖励,银牌和铜牌分别能进账 6.25 万和 4.25 万欧元。与四年前北京奥运会相比,俄罗斯的奖金几乎没有变化。除了能拿到政府奖励外,得到奖牌的运动员还可以接受赞助商和当地政府奖励。这也延续了北京奥运会时的奖励方式,四年前在北京建功立业的俄罗斯队员都从各种体育基金会和个人赞助商那里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还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房子、车和现金。

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中国学习俄罗斯,还是俄罗斯学习中国。中国代表团虽然还没有公布伦敦奥运会奖金分配方案,但显然不

享受“特权”政策的不只是中国。韩国在伦敦奥运会的目标是夺取 13 枚以上金牌,保住世界十强地位。为鼓励选手拼搏,他们表示将在北京奥运的基础上再提高奖牌奖金。韩



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金牌能拿到人民币 28 万元的奖励，已经是雅典奥运会时的 2 倍，而伦敦奥运会上将加到人民币 33 万元。

由于知名运动员多有商业赞助，所以这些政府奖励也许还不是韩国运动员最在乎的。在韩国，对体育界最隆重的奖励在于免服兵役。按照韩国法律，每个身体状况合格的男性公民在成年后必须服两年两个月兵役，不过，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以及亚运会上取得金牌的运动员，都可以免除兵役，只需接受为期 4 周左右的军训即可。雅典奥运会乒乓球冠军柳承敏、围棋世界冠军李昌镐等韩国名将都免服兵役，只进行了短期军训。

奥运英雄成为国家公务员也是许多国家的奖励方式。朝鲜规定运动员如能在奥运会上获奖牌将得到国家公职。希腊的奥运冠军选手也可获得一个不错的公务员职位，通常是当上军队中的军官。

还有些有趣的奖励方式。比如宾德拉为印度赢得自参加奥运会以来第一块个人金牌后，成为印度英雄。除了 1000 万卢比（约合 163 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外，印度体育部门奖励他可终身免费乘坐火车的头等车厢。为蒙古夺得奥运会历史上首块金牌的柔道选手图布辛巴亚尔除了将获得蒙政府的 1.2 亿图格里克（约合 1 万美元）的奖金之外，蒙电信公司还免费向图布辛巴亚尔提供“9999-9999”的电话号码，因为“9”对蒙古国人来说是一个吉祥的数字。白俄罗斯规定，该国运动员若夺得

奥运金牌，除获得 10 万美元奖金外，在北京奥运会上，该国一家肉类厂想出一个新点子——为冠军终身供应免费香肠。而白俄罗斯极受欢迎的女子篮球队则受到特别待遇：她们无论夺得什么名次，队员们都将终身免费享用香肠。“啤酒王国”德国也有类似奖励政策——获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每个月可获得 50 升免费啤酒。澳大利亚也喜欢人性化的奖励，为所有金牌获得者制作个性化纪念邮票。在这方面，北京奥运会时，中国也曾效仿。

总体来讲，通常都是金牌大户给的少，鲜有金牌的国家给的相对较多。比如新加坡就开出 50 万欧元的高价力求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作为新加坡邻国的马来西亚对于奖金也非常大方，为金牌得主提供了 20 万美元的奖赏。阿塞拜疆 75 万美元同样非常诱人。当然，有些只是一个数字，实现的可能性不大。比如黑山共和国为金牌悬赏 60 万欧元，这个人口只有 70 万的巴尔干国家，何时才能诞生一个奥运冠军？

另一东南亚国家泰国出手倒是大方：奥运冠军将得到大约 1000 万泰铢（约合 31.4 万美元）的奖励，但是这笔钱并不是一次性支付给运动员，“第一笔支付给奥运奖牌运动员的报酬，为他所得奖金的一半。另一半会在余下 20 年间，以分期付款的形式直接打到运动员的银行账户上。我们希望大多数运动员能管理好自己的财产。”泰国奥委会官员差龙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看到运动员一下子就把金钱挥霍空了。和泰国一样采取“分期付款”的还有波兰，他们的方案是：奥运金牌得

主从 35 岁起，可以每个月领取 1000 欧元的退休金。

相比而言，亚洲体育强国日本对奥运选手的奖励并不算大方。金牌得主只有 19 万元人民币，银牌和铜牌得主分别是 12.5 万元人民币和 6.3 万元人民币。与该国人均 26.6 万元的年收入比较起来，这份奥运奖金真不算什么。不过，日本很注重田径。日本田协宣布，日本选手如能在奥运会田径比赛中荣获金牌，将能得到 1000 万日元(约合 65.8 万元人民币)，银牌得主也能得到 600 万日元，铜牌为 400 万日元。

金牌大鳄美国在发放奖金的力度上也不

慷慨，其对金牌得主的官方奖励仅为 2.5 万美元。不过，运动员也大可不必计较这些，因为在这个商业化高度发达和造星业高度发达的国度，他们完全可以在商场中“以丰补歉”。

这一次伦敦奥运会，最“抠门”的就要算东道主了。英国奥委会日前宣布，不会给在伦敦奥运会取得金牌的英国运动员任何现金奖励。英国奥委会一位发言人说：“我们认为经济上的回报不会激励运动员登上领奖台。英国国家队的运动员需要有着对运动的热爱和执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渴望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最伟大的体育舞台——奥运会上，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上接第 42 页) 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 100 多年的时间。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

1954 年毛泽东对俞平伯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证明了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厚爱”。

毛泽东批注过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并认为俞平伯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节。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不过是个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这种“自传说”同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的评价相去甚远。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

似，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这种“消遣作品说”，与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观点是有很大差距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种评价与毛泽东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反差是相当大的。俞平伯认为，文学批评的眼光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认为，“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可见，毛泽东与俞平伯审读《红楼梦》的视角不同，运用的思想武器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迥然不同。所以，当“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红楼梦》时，毛泽东当然会支持这场批判运动了。

## 市地方志办公室 召开业务工作务虚会

结合地方志业务涉及面广、工作周期长的特点,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围绕全市中心工作,不断拓展工作思路,提早谋划明年工作,积极推动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8月3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业务工作务虚会,市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冯艳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各处室分别就全市二轮修志、年鉴编纂、地情资料开发与利用等方面汇报了今年以来的工作情况,并就当前全市地方志工作发展形势和2013年工作思路进行了分析交流。各分管领导也对明年各项工作中需要突破和解决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补充完善。最后,办党组书记、主任冯艳阳做了总结讲话。

冯艳阳主任要求要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地方志工作定位。对于2013年全市地方志工作,冯主任强调要抓好四个方面:一是在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做好修志编鉴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大地情丛书开发与利用,继续推出各种高质量的地情资料成果。二是积极创新思想观念和工作机制,坚持众手成志,通过外聘专家合作和修志项目承包等方式,进一步加快我市二轮修志工作进度。三是结合《西安市地方志工作2011—2020年规划》和全市当前重点工作,提出本办今后两年的工作重点。四是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深入抓好地方志专家队伍和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努力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进一步提高机关干部的专业理论水平。

## 务虚会发言摘要

### 秘书处处长 崔义萍：



二轮修志、年鉴编纂和地情丛书开发是我办主要职能工作。近年来,编纂地情丛书尤显重要。我办的地情丛书编纂项目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地方志工作 2011—2020 年规划的通知》文件精神,可以将编纂项目确立为短期、中期和长期。

短期项目,即为结合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在半年左右能够编纂完成的项目,如《为西安喝彩》《世园在西安》等。

中期项目,即结合地方志工作特点,挖掘历史资料或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历史事件编纂项目,一般在 2-3 年左右完成,如《西安 60 年图志》《西安府志》。

长期项目,即编纂大型系列丛书,计划在 5-10 年完成的项目,如《西安大百科全书》等。

有计划、有步骤地确立项目,这样做的好处是可确保每年都有 1-2 部高质量的地情丛书出版,不仅可以提高地方史志部门的影响和

地位,同时,带动了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 市志处处长 杨军亚：

关于市志编纂工作:按照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的总体安排和进展情况来看,任务重、时间紧。要编纂出版高质量的志书,下一步要从下面几个方面



加强力度:①要建立良好的市志编纂工作机制;②调配力量充实市志编纂队伍,确保编纂工作整体质量和进度;③参与市志工作的同志沉下身子静下心来研究业务,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确保业务指导的效果;④要多方调动承编单位修志人员的积极性,加大工作的配合力度,确保上下联动,提高志稿质量。

关于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在西安地区营造关注、关心、参与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氛围,建设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平台,倡导读志用志,服务社会。①狠抓主业,确保市县两级志书和综合年鉴的质量和速度;②科学规划开发

多种表现形式的地情资料(如影像版);③加强修志人才队伍建设;④多举措吸引专家学者开展地方志研究和相关工作;⑤扩大宣传力度,争取社会各层面的支持和配合。

### 区县志处处长 彭栋为:



方志机构在不影响修志主业的前提下量力而行,适当开发一些与志鉴业务紧密相关的产品以拓展地方志工作的空间、领域,扩大方志事业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从而开疆拓土,以有为而冀有位,求得地方志事业的持续发展。但勤勉劬劳、积极进取不是临渴掘井,饥不择食,也不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捡到篮子便是菜”,须在选项、任人上深入论证、充分酝酿,立足于“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凡具恒久的划时代意义且具有历久弥新价值的东西,即便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也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对于“只供一时所读的书”,或者说是毫无价值、速生速朽的先天性劣质类东西,我们当弃之如敝屣,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坚决“不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声名远播四海并垂于千秋,但就因为碍于情面,不敢说“不”,一生为人撰写了不少的墓志铭一类虚誉性文章,当时便多有微词,后世更累获诟病。前车之覆,殷鉴不远,宜当引起我们的深

思和警戒!西哲罗斯金有言“所有的书都可以分成两大类:只供一时所读的书,可供一切时代所读的书”。但愿我们所耗力编纂问世的书籍不是文化垃圾与废品,而是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大鹏”!

### 地情资料处副处长 高长安:

市志年鉴是地方志工作的根本,是记录地方史的载体,了解全面情况的载体,是第一手资料,具有综合性、地域性的特征,地情资料是市志年鉴工作的辅助和延伸。



一、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和编纂工作。该工作既是文化保护,又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部分。

二、策划好旧志整理工作。旧志整理是地方志工作的职责之一,我们拟与专家学者联合点校宋敏求《长安志》。该志记述唐都长安宫城、坊市及属县的专著,20卷,对研究长安的历史地理有较大参考价值。

三、地情资料的征集和编研要采取多种形式。在传统方式下,还要“走出去”,拍摄图片或者视频,建库或者进行开发。

四、地情书籍合作编写的方法要研究。通过《民国西安词典》编纂,我有一些启发:利用老专家研讨项目和审稿,确保书籍质量;选择年富力强、具备较强协调能力的专家学者负

责组织工作。

### 年鉴处处长 姚文东：



首先地方志工作一定要服务大局,要为中心工作服务、为现实服务,具体到西安,就是要为西安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服务。

其次,地方志工作必须要找准现实服务的切入点,找准“聚焦点”。比如,建国 60 周年,我们编纂了《西安 60 年图志》;世园会召开,编纂了《世园在西安》;辛亥革命 100 周年,正在着手编纂《西安百年大事要览》等都是很好的切入点。因为这些“点”,领导、群众都较为关心,容易使人关注,产生“放大效应”。第三,地方志工作一定要寻求领导和社会的广泛支持。要建立给市级领导送书制度,使新任职的市级领导在上任伊始就能看到新编地方志书(包括年鉴、其他地情资料书籍);新编纂出版的地方志书(包括年鉴、其他地情资料书籍)在第一时间就能被市级领导所看到,使领导了解地方志书,进而支持方志事业。要联合宣传、文化和其他市级部门,搞一些联合编纂或者宣传活动,扩大声势和影响力。第四,地方志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光在内容上要体现地方特色,还要在志书的种类和形式上大胆创新。音像、影像志书在未来将会成为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比如,

在方志馆建设方面,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不是很了解,我们是不是可以分衣、食、住、行等方面搞一些实物展示,再借助现代化的一些声、光手段营造当时的氛围,使人们感性的认知当时的社会状况。总的来说,地方志工作就是要根本改变过去“死水一潭,波澜不惊”的状况,走出书斋,面向现实,积极为现实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为西安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服务,大胆创新,焕发青春与活力,走上一条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科学发展之路。

### 机关总支副书记 崔桂琴：



1.对一些为纪念重大活动、重大事件等而出的短、平、快书籍进行提前策划、提前介入,可以避免因上马仓促带来的一系列弊端。

2.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对全市重点项目进行关注,积极与承担市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的单位进行沟通和调研,发挥各自的优势、特长,编一些有实用价值的地情资料精品丛书。

### 监察室主任 富小云：

1.围绕中心工作,做好地情资料的编辑与整理。

近年来,我办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60 年图志》《西安府

志》《民国西安词典》等等。希望能继续发扬成绩，做好地情资料的编纂和整理工作，为西安的文化



建设添砖加瓦。地情资料丛书的编纂要有较为详细和具体的计划，做到稳扎稳打，保质保量。

2.充分发挥信息中心的作用，搞活地方志工作。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要有所创新。各业务处室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积极配合信息中心的工作，借助电子化设备，将我们的工作成果电子化，使我办的各项工作走上信息化的道路。通过我办的信息中心，做活做强做大地方志工作。

3.加强队伍建设，注重培养年轻干部的业务能力。

我办今后三四年内，将有一批处级干部退休。为防止青黄不接的现象发生，当务之急要加紧培养年轻干部，要给他们压担子，注意日常工作的培养和指导，处长们要放手让年轻人干，年轻人要勇于担当。争取三五年内，培养出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年干部。

#### 地情信息中心主任 张耀：

当前，我办形势是近年来最好的。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党组班子成员综合素质高，政治、业务、处置问题等方面都给下级党员干部带了个好

头。现在，我办歪风邪气没有了市场，因此，完成任务的业绩快速上升，工作创新的成绩不断显现。

2.人才结构比较合理，业务水平处于较高的一个层面上。我们有一大批正值中青年的干部，他们或参与过一轮修志，或在志书、年鉴、地情资料方面曾经取得过成绩，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可圈可点。发挥好了这些干部的作用，我办的工作前景可以看好。

3.我办的办公设备已经处在“超前”状态，提高人员的使用水平可以使我们的工作事半功倍。从个人更新计算机的周期、网络使用的点击量、数据库的建立及继续扩容等



方面，和全国同行业单位相比，我们都处在上游范畴。如何发挥这些“利器”作用的问题，就是提高使用人的使用水平的教育问题。因此，我们要抓紧培训、提高效能，否则就是浪费资源和资金。

最后，我提几点建议：

1.撰写志、鉴是我们的主业，质量问题是重中之重。“官书”不信，有啥可信？

2.修志中的资料长编，是编写地情资料丛书的最好源泉之一，地情丛书资料可叙可论，正好发挥志书资料长编中不“论”的资源。

3.用好互联网，其实我们要的东西，网络里面大部分都有。

## 长安区举办 《长安区志》撰稿人员培训班

7月16~17日,长安区举办《长安区志》撰稿人员培训班,区级机关各部门、单位、街道的撰稿人员120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上,听取了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志处处长彭栋为“地方志基本知识”,碑林区志主编吉勇“关于部门志稿撰写应注意的问题”,《长安区志》副主编张振琪“《长安区志》篇目大纲说明及行文规范”等专题讲座。参加培训的撰稿人员都能集中精力,排除干扰,遵守纪律,按时参加讲座,认真听讲,细心做好笔记,秩序良好。分组讨论时积极发言,针对《长安区志》篇目大纲和有关工作提出了很好的修订意见。此次培训为编好《长安区志》打下了良好基础。

(长安区地方志办公室 张振琪)



## 新城区《西安村落记忆》 资料征集工作进展顺利

《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承载着村民们瞻望先祖奋斗史的期冀,是一项事关文明建设的惠民工程。这项工作开展以来,我局按照市、区要求,迅速着手安排部署。一是责成专人负责,配齐配强人员,进入工作状态;二是从硬件设施上予以支持,购置扫描仪等

专用器械,重点解决历史照片的处理等难题;并要求局办公室相机随时备用;三是召集各村负责人专题会议,要求全力配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此项工作。

目前,从工作进程看,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开端良好,工作进度在掌控之中;涉及的文字



和照片方面,工作量已接近完成一半。

### 一、基本概况

由于撤村建居工作已经完成,新城區现已无农村,原 13 个城中村改称社区,且大都与原村名对应,但亦有例外,如八府庄村改称八府庄园社区、自强村改称丹凤门社区等。(为习惯起见,以下仍称为村)

截至目前,10 个村完成城改拆迁,其中 3 个已陆续回迁。余下的 3 个村,年内有 2 个可能完成整体拆迁,最后面临拆迁的南张村工作亦在运筹之中。

由于近几年各村均处在城改转型期,工作重心全在城改上,没有过多地留意史料的留存,对此项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难度。一者拆迁致使本就匮乏的原始资料与历史照片遗失,造成无法复原之憾;二者平时留存史料意识不强,不注重收集整理,现用时不能有效而及时提供。

### 二、工作举措

1.找准切入点,从基础工作入手。在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基础上,于 5 月中旬向基层再发通知,再次明确工作方向、工作任务,要求落实到人,与局建立业务联系,畅通联系渠道。强调与区志办加强沟通,交流信息,资源共享,形成工作互动机制。

2.不坐等资料,坚持走下去,入村入户征集。在 6 月至 7 月上旬,我们多次到各村督促,查检村史资料准备及完成情况,并对各村现状进行拍摄,重点征集历史照片。

事实证明,经过不断接触、交流,一定程度上能激发村组人员的工作热情,唤醒村人

对村史的记忆,从不同渠道(如以往开展的各项活动中)搜寻到历史照片。八府庄村就是在我们几次提示后,在整理留存资料中找到了很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照片;南张村在启发下,组织人员入户收集历史照片;韩南村准备从村民私人手中购买收藏照片,可期待;韩北村、含元殿村能够提供记录村容村貌的光盘(由于城改和其他大型活动而定制),由中可截取图片,这种方式也值得肯定。

3.加强座谈、调研,解决村史模糊与疑难问题。就遇到的某些村名来历不确定、内容年代不清晰等问题,在查询无果情况下,我们先与村组人员座谈,再征询村上老户人家,希望能找到信服度高、有根据的解释;虽然一些问题一时难有定论,但其中不乏可循之迹,仍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

4.行动迅速。如前期获知新兴村与南张村将于不久陆续拆迁消息后,我们当即前往两个村进行拍照留存。

### 三、工作进展

1.各村简史方面。已基本完成 5 个村简史的整理、文字修改、内容完善,再稍加润色、编辑、充实,便可初步定稿。

2.历史照片方面。截至 7 月 19 日,已收集整理到大致 6 个村的部分历史照片,正在甄别、分类中,准备用扫描仪进行部分处理,制成电子版。

3.现状照片方面。通过近期对各村现状的拍摄工作,直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目前正在全面整理中。

(新城區农村工作局)

## 临潼区志办召开 《西安村落记忆》编纂工作推进会

7月20日上午,临潼区地方志办在秦陵街道办事处会议室召开渭河南14个街办180个行政村《西安村落记忆》编纂工作推进会;7月25日上午,在雨金滩张十字汤澎眼科医院会议室召开渭河北9个街办105个行政村《西安村落记忆》编纂工作推进会。区人大副巡视员、区志编辑部副主编张东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地方志办主任童振宇、区地方志办副主任马文雅、《临潼区志》编辑黄伟兴、丁伯昭、杨联军和全区23个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负责干部及各行政村《村落记忆》撰稿人300多人参加会议。

会上,《临潼区志》编辑黄伟兴就村落的界定及如何撰写资料进行培训,杨联军对资料的撰写提出要求,丁伯昭就《各街办村落记忆众名人征集范围》做了说明,提出了入村落记忆人物的八个方面要求。

区人大副巡视员、区志编辑部副主编张东江在会上强调指出:一是编写《村落记忆》是区委、区政府贯彻中央关于加强文化建设决定的一项重大措施,也是我区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各街道党工委、各街道办事处一定要高度重视。二是要落实人员,落实经费。把那些有一定政治觉悟、熟悉村情、且具有一定文字工作水平的人员吸纳进来,提供办公环境,保障工作经费。三是要高质量地按时完成撰稿任务,确保8月底完成政府下达我区《村落记忆》稿件撰写任务。

(临潼区地方志办公室)

## “百姓”曾用来指贵族

“老百姓”是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自称,意思是自己是平民普通人。其实在战国以前的时代,“百姓”这个词指代的却是贵族。因为我国奴隶社会中只有贵族有姓,有土地有

官爵者才有姓,而庶民无姓,遂以“百姓”作贵族的通称。具体来说,这个词在商指奴隶主阶级,在周指封建领主阶级;有贵贱之分,如西周以姬姓王族为贵。春秋后半期,宗族逐渐破坏,土地个人私有的地主阶级代替土地嫡子世袭的领主阶级兴起,百姓逐渐失去贵族的意义,社会地位与庶民相似。所以这个词也逐渐演变为泛指平民。

### 为什么 一件事没结果叫『黄』了

过去做生意,开张的那天,门外要贴喜报,大红纸上要写着“开张大吉”4个字。如果一家买卖没经营好,或者是干着干着,掌柜的这山望着那山高,卖着日用杂货,他又要开饭馆去了,老字号关门,也要有一个告示,这时候就要用一张黄纸,写上“收市大吉”贴在门上,表示这买卖不干了。由此,人们就把一家的生意关门说成是“黄”了,而且,把凡是没有办成的事情统统说成是“黄”了。

### 中国第一位奥运冠军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上,以566环的成绩夺得男子自选手枪射击比赛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奥运会上获得冠军的运动员,实现了中国在奥运史上“零”的突破。



### 中国第一位奥运女冠军

吴小璇,女,浙江杭州人。1958年1月26日生。1981年入选国家队。1984年8月3日,她在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3×20比赛中技压群芳,成为中国运动员中第一位女子项目奥运会金牌获得者。



公元前 206 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子婴在仅当了 46 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刘邦进咸阳后,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霸上。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

## “约法三章”的典故

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现在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法三章。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

成语“约法三章”即指规定出几条共同遵守的条款。约,协商,议定;章,指条目。

## 宦官和太监有何区别

在人们的印象里,宦官与太监是一码事,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据文学考证得知:其一,最早的宦官并非都是阉人;其二,宦官与太监在封建社会的概念是有别的。

古代宦官是对在皇宫里为皇帝及其至亲服务的官员的总称。东汉以前,充当宦官的并不都是阉割之人。“悉用阉人”是在东汉之后。太监一词的出现最早在辽代,是辽代政权机构中的官员称谓之一。辽代的太府监、少府监、秘书监等设有太监,元代因袭辽制,所设各监也都有太监。元代太监尧诸监中的三级官吏,并非尽是刑余之人。到了明代,太监和宦官有了较固定的关系。充当太监者必是宦官,但宦官并不都是太监。太监是宦官的上司,是具有一定品级、俸禄的高级宦官。太监成为宦官的专称是从清代开始的。因为清代将侍奉皇帝和皇族的宦官都冠以太监之称,故此,宦官与太监便混为一谈了

## 中国人口最少的姓氏



中国人口最少的姓氏——难,基本上在河南洛阳、武陟等地,是由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的姓发展而来。“难”原本是一种鸟类的名字,由于当时的人崇尚鸟类,把姓起成了“难”。“难”姓在中国已极少存在,不过数百人。



## 山坡羊·骊山怀古(二首)

◎ (元)张养浩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骊山屏翠,汤泉鼎沸,说琼楼玉宇今俱废。汉唐碑,半为灰,荆榛长满繁华地,尧舜土阶君莫鄙。生,人赞美;亡,人赞美。

### 【赏析】

张养浩(1269~1329),汉族,字希孟,山东济南人。号云庄。元代著名散曲家。诗、文兼擅,而以散曲著称。其中《山坡羊·潼关怀古》流传至今,是晚年在陕西的九首怀古曲中最有名的一首。著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诗文集《归田类稿》。

他是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第23代孙。少年知名,19岁被荐为东平学正,历官堂邑县尹、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因看到元上层统治集团的黑

暗腐败,便以父老归养为由,于英宗至治二年(1322)辞官家居,此后屡召不赴。文宗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特拜陕西行台中丞,遂“散其家之所有”“登车就道”(《元史》本传),星夜奔赴任所。到任四月,劳瘁而卒。追封滨国公,谥文忠。

山坡羊是曲牌名。本曲为作者登临骊山,放眼四顾,感慨丛生所作。全曲没有深奥的文字,也没有令人晦涩的典故,更没有华丽词藻。而这些质朴重拙的文字,却吟出了千古不朽的绝唱!“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作者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兴亡,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亡交替,是无休无止的破坏,无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都化为灰烬。